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五四以来—文化名人与祖国 2



五四以来—文化名人与祖国

文学家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现代著名作家，浙江富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少产。7岁进私塾读书，14岁于县立高小学堂毕业后，考入嘉兴府中学，聪颖强记，9岁已能写作旧体诗词。1913年随长兄郁华到日本，次年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结识。预科毕业后，1919年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其间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及哲学名著，并开始写白话小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曾和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了以抗日为宗旨的夏社，并筹备创立新社。1921年，他的处女作《沉沦》问世，由于“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震动了当时的文坛。随后又发表了《南迁》、《银灰色的死》、《风铃》等。1922年7月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先后主编《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工作之余先后发表了小说《茫茫夜》、《茑萝行》、《采石矶》、《还乡记》、《春风沉醉的晚上》及文艺论文《文字上的阶级斗争》等。1924年在北京大学任讲师期间与鲁迅熟识。1925年初应邀去武昌师范大学任文科教授，其间写成《文学概说》、《戏剧论》、《小说论》。次年3月与郭沫若一起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教授。年底回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事务。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1930年与鲁迅、宋庆龄等成立进步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4月从上海移居杭州。这个时期以写游记、散文和诗歌为主，曾陆续出版了游记集《履痕处处》、《达夫短篇小说集》、《达夫日记集》、《达夫散文集》、《达夫游记集》，随笔散文集《闲书》及中篇小说《出奔》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精神大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参加抗战工作，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937年冬到香港和南洋群岛一带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曾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等组织的重要职务，主编《星洲日报》，宣传抗日。后被迫逃至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坚持抗日斗争。1945年9月17日，因华侨奸奸洪根培向日本宪兵总部告密，被残无人道的日寇秘密杀害于丹戎巴葛的荒野中。

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这位爱国主义作家为革命烈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郁达夫小说集》、《郁达夫散文集》、《郁达夫游记集》、《郁达夫日记集》、《郁达夫抗战诗文抄》、《郁达夫南洋随笔》、《郁达夫传》等。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将永远不可磨灭。

东渡日本

浙江富阳，这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县城，因境内一川如画的富春江而得名。它既是江南富饶的鱼米之乡，也是一处山明水秀的游览胜地。“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造化钟神秀，地灵人更杰。现代著名的作家、诗人郁达夫，1896年12月就诞生在这秀山丽水之地。

1913年，年仅17岁的郁达夫完成了杭州中学学业，结束了两年自学的

生活，跟随长兄郁曼陀舟船远去。不过，这一次不是在富春江漫漫行船，而是在大海上航行；不是离开故乡去省府，而是离开中国到一依带水的邻国日本。从此，他踏上了人生的新里程。

经过8个月的刻苦学习，郁达夫如期参加了1914年7月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暑期招生考试。7月下旬，当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发榜的那一天，郁达夫高兴地 from 榜上找到了郁文的名字。9月，郁达夫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学习文哲、经济和政法，后来，又转学医学。当时，郁达夫作为一个弱国国民，在这个东邻岛国，到处受到歧视和侮辱。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向中国提出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当时总统袁世凯，为了实现他复辟帝制的野心，出卖国家主权，完全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于是日本人更加盛气凌人，处处仗势欺压中国留学生。郁达夫曾在《雪夜》一文中，反映出他那时的悲愤心情：“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桎梏的历程。”他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绝不能再这样任人欺凌和侮辱下去！

郁达夫失望地离开这个“异国的首都”，于1915年9月11日夜坐火车到名古屋。初进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他易辙学医，虽然精神压迫和威胁减少了一些，但是，青春期的苦闷和怀乡思家之念，又引起他的忧郁情绪，并一度发展成刺激性神经衰弱症，影响了他的正常学习。这一年春假考试，7门学科只考了3门。

郁达夫在名古屋求学期间，中国正处在深重灾难中，军阀混战，殃及百姓，无有宁日。这时的郁达夫，虽然身在海外，却对祖国政局十分关切，家信中经常提及国事。“国事日非，每夜静灯青，风清月白时，弟辄展中国地图，作如此江山竟授人之叹。”“国事弟意当由根本问题着想。欲整理颓政，非改革社会不可。”郁达夫找到了中国不能强盛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非改革社会不可”的积极主张。为了实现改革社会，拯救中国的心愿，于1916年秋季，毅然从医科转入到法学部政治学科。1918年他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经济，立志回国推进民主政治，为中华民族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蜚声文坛

也许是故乡的奇山丽水，赋予了他涌泉般的创作灵感；也许是东渡日本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回国后，郁达夫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加上他在国外亲身感到作为一个弱国国民，到处遭受歧视和凌辱的痛苦，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十分强烈。他决心要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创办一种新文学杂志，用以唤起民众拯救中国。从这时起，郁达夫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著名作家。

郁达夫在积极筹划组织新文学团体的同时，文思滚滚，曾不断推出篇篇新作。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就是在这期间创作的。1921年10月15日上海泰东书馆将三篇小说结集为《沉沦》出版，这是郁达夫献给读者的第一个小说集。郁达夫一边从事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的工作，一边辗转在安庆、北京、武汉的大学任教。这期间，他陆续写了一系列小说，其中以《茑萝行》、《还乡记》、《还乡后记》、《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最为出色。然而，他总是受到恶势力的打击和排挤，终于返回上海的亭子

间，又过上了他的卖文为生的苦日子。

1926年，在南方广东革命形势的鼓舞下，郁达夫满怀信心南下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期间，他以犀利的笔触写出了著名的政论文《广州事情》和《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有力地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政策。国民党当局为了拉拢他，以不封闭“创造社出版部”为诱饵要他“帮助党务”时，他立即“托病谢绝”；当有人企图让他到国民政府去“做个委员”时，他断然拒绝了。郁达夫不愿意同那些“爬乌龟钻狗洞”的政客们同流合污，在生活的风雨中，他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自己的政治节操。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提名郁达夫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投身抗战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事件”，发起全面侵华战争。9月，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终于在23日宣告联共抗日，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幕。侵略者的铁蹄，人民反侵略的吼声，震撼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拔剑光寒倭寇胆，拨去手指天心曰。……会稽耻，终当雪。”郁达夫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入了伟大的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

郁达夫从杭州回到福州，毅然决然地投入抗战宣传工作活动。他在登于山谒戚继光祠时，曾步岳穆原韵，写下一首凭踪抒怀的《满江红》，歌颂了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的“丰功伟烈”，激励人们奋起为祖国雪耻复仇。10月，郁达夫为配合全国抗战高潮的掀起，联合福州进步文化人士，组成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并被推荐为常务理事。此后，他替协会主编的《文救周刊》、《小民报》、副刊《救亡文艺》，写出不少抗战政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民众“加紧团结，加强抵抗”，“准备抗战到底之决心”。1938年，当他听到杭州失守，故乡富阳也落入敌手，而年迈的母亲陆氏，因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园被迫绝食而亡的噩耗时，他哀恸欲绝，从而也更坚定了他报仇雪恨的决心。3月，他应好友郭沫若的邀请，离开福州经南昌、九江，来到当时抗战中心——武汉。在武汉，郁达夫见到周恩来。并在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担任“设计委员”，同时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在那些日子里，郁达夫曾两次奔赴徐州台儿庄和河南前线，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慰问军中将士，写下不少激动人心的战地报告和诗词。

由于武汉沦陷，文艺界抗敌力量分别转移。郁达夫于1938年底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是华侨集中的地方。郁达夫到达新加坡后，曾写出大批激励抗日和坚定抗战必胜信念的政论。他在新加坡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便是政论《估敌》，刊在1939年元旦《星洲日报》。文中不仅揭露日本侵略军的侵略行径和侵略野心，更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分析了抗战形势，鼓励广大侨胞支援抗日救亡。以后，在他所编的各种副刊上，又不断发表政评，痛斥汪精卫“上伪京去组成出卖党国、出卖民族子孙的伪政府”，号召同胞“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加强抗战的决心”。1939年到1941年3年时间内，郁达夫担任了《星洲日报》副主编，兼任《华侨周报》主编；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等多种职务，领导文化界抗日工作，他曾先后在新加坡发表有关抗战的政论时评，共达100余篇。

南洋殉难

1941 年，战争的烟云笼罩着新加坡，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开始轰炸新加坡。形势非常危急。在这一年的 2 月 4 日，郁达夫、胡愈之等十几位文化战士一起撤离了这座城市。

一艘船在马六甲海峡中颠簸航行，震得郁达夫更加心神不宁，风雨飘摇、风月动荡，使郁达夫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和凄凉之中。3 年前达新加坡时，有妻子、儿子，可眼下中剩下孑然一身。由于多年不和造成感情裂痕，发展到不可弥合的地步，郁达夫与他妻子王映霞终于离异了，人去屋空，郁达夫独自留在远离祖国的星岛上，心情十分痛苦。

后来，载着郁达夫等人的这艘船到苏门答腊，先后在印度尼西亚的好几个地方落脚，最后，在一个叫巴爷公务镇上居住下来。在当地一位爱国华侨的帮助下，郁达夫化名赵谦，以老板的身份，经营与同伴集资开设的“赵豫记酒厂”。就这样，郁达夫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在日本的这个占领区过了一段安定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灾难的影子很快就笼罩过来了。

1944 年春，一个叫洪培根的华侨汉奸，认出了巴爷公务的酒厂老板就是郁达夫。一开始洪培根托郁达夫为他作媒，郁达夫拒绝了他，从此他怀恨在心，终于，向日本宪兵总部告发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还诬陷他是间谍。

这时，抗战已接近胜利之日。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漫长夜终于到了头，当郁达夫听到这个喜讯时，他是何等的欣喜若狂啊！正在这个时候，灾难却降到了郁达夫的头上。10 天后的一个傍晚，日本帝国主义竟然将郁达夫秘密逮捕，并于 9 月 17 日将他残酷地杀害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荒野之中。时年 49 岁。

当郭沫若闻悉他的挚友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消息时，写下了一首情深意切的诗篇，赞颂爱国作家、诗人郁达夫和他的哥哥爱国法官郁曼陀：“难兄难弟同殉国，春兰秋菊见精神。能埋天地天不死，终古馨香一片真。”

（张建一）

戏剧家

——田汉

中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戏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田汉（1898～1968），字寿昌，笔名陈瑜、首甲等，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田家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在“意坚识卓、百苦不回”的母亲的影响和教育下，6岁入私塾开蒙，学习了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古籍，由此打下比较深厚的文化功底。9岁时，父亲不幸病逝，在其舅父易梅臣的资助和指导下，于1912年考入由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1914年东渡日本留学，先习海军，后学教育，终因自幼酷爱文学、戏剧而投身于文学艺术事业。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曾一度回国参加救国运动，回日本后参加“中国少年学会”。1920年归国后，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与郭沫若等人组织创造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运动，创作并发表他《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剧作，这些剧作是当时中国话剧园地上的奇葩。在20年代，先后同欧阳予倩、洪深等人一起创办了“南国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电影剧社”，并主编《南国周刊》和《南国月刊》杂志。他所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在恶劣的条件下艰苦创业，开创了中国话剧的新局面，对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30年3月，田汉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被选为7名执行委员之一。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道路的飞跃时代。之后，他便以全部精力投身于左翼戏剧运动。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主席。1932年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以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活跃于文坛。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他的组织才能和创造智慧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话剧《第五号病室》、《乱钟》等，电影《三个摩登女性》等，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喊出了人民心声，鼓舞了人民的战斗热情。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曲》立即传遍了祖国大地，强有力地鼓舞着全国人民团结战斗，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5年春，上海文委遭敌人破坏，田汉同阳翰笙等人同日被捕，1936年因病经徐悲鸿等人保释出狱医治。“八一”宣言发表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田汉联合应云卫等戏剧界著名人士，在南京组织了“中国舞台协会”，大力宣扬抗日救国运动。此期间，他创作了《回春之曲》、《黎明之前》、《洪水》、《号角》、《晚会》等剧作，并把托尔斯泰的《复活》改为舞台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田汉立即投入抗战戏剧运动。1938年到武汉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主持电影、戏剧、美术等宣传工作，组织抗敌演剧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对抗敌文艺运动作出了多方面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及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并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他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文艺方针，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开拓了新

的人民戏剧事业。特别是在戏剧改革方面，他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导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新老艺人，壮大人民的戏剧队伍，为繁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汉在从事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大量的行政组织工作的同时，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创作、改编了多种话剧、戏曲剧本，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散文、诗歌、评论、回忆录和学术论文。如话剧剧本《关汉卿》、《文成公主》，戏剧剧本《白蛇传》、《谢瑶环》等。

田汉自“五四”时期开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革命的文艺事业，不愧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奠基人，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在戏剧园地拓荒、耕耘，一生创作的话剧、戏曲、歌剧、电影剧本百余部，其它诗歌、歌词更是不计其数。他的优秀代表作，如《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丽人行》、《关汉卿》等，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堪称世界戏剧艺术之精品。

田汉的作品脍炙人口，然而他的爱国爱民的战斗精神，更令人难以忘怀。

“在群众中最安全”

30年代初，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田汉不仅没有退却，而且毅然决然，投向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组织和推动左翼戏剧运动和电影运动。

1933年，田汉亲自主持“左翼剧联”发起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公演。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一演就是一个月。当时党组织考虑到田汉的安全，多次劝他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暗算，他却坦然地说：“在群众中最安全！”就这样，他每晚亲临后台，挤坐在化装的边角，根据当天新闻，迅速写出富有战斗性的话剧交给演员。这些当场演出的小剧，极大地鼓舞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有一次，田汉险些被国民党特务射来的暗弹所伤。田汉的爱国言行，极大地激发了江湖艺人——大力士查瑞龙和彭飞的爱国热情，他们为对付巡捕特务到剧场捣乱，分别把守前台、后台，使特务、暗探望风而逃，保卫了大家的安全，保证了整个义演的圆满结束。

这件事尽管距今已60多个春秋了，但田汉“在群众中最安全！”的慷慨激昂的声音，仍回荡在千百万人们的心间。

陪郭沫若共进“地狱”

1937年，震惊世界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宣告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国土的热潮中，田汉被解除软禁后，立即从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沦为“孤岛”的前夕，田汉离沪经南京、武汉回到故乡长沙，又一次白手起家与廖沫沙、张曙等创办起《抗战日报》。在报纸的发刊词中，田汉公开宣布它是郭沫若为社长的《救亡日报》的姊妹刊。两个《日报》共同为抗敌宣传服务，受到广大爱国读者的热列拥护。

1938年2月，郭沫若接到军委政治部调他去三厅任厅长的任命。由于郭沫若不满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阴谋手段，拒绝了这一任命。可是，田汉经过对

形势和抗战大局的深思熟眠，认为只有上任，才有利于抗战大局。为了动员、鼓励、支持郭沫若上任，田汉在繁忙的社务中挤出时间，竭尽全力为郭沫若做了安排，他召集长沙文化界人士为郭沫若举行盛大的宴会；动员朋友们请郭沫若讲演、写字、听戏；陪同郭沫若一起去游览各名胜古迹，凭吊先贤古迹；还同他议论改编传统剧目为抗敌宣传服务的问题；并遵照周成为的指示，多方面分析譬解，敦促他接受政治部的任命。当郭沫若激愤地表示“那是一座地狱”时，田汉对他恳切劝慰：“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为了抗战的大局，他下决心放下《抗战日报》的事务，陪同郭沫若共同进“地狱”。这年4月1日，三厅终于正式建立，田汉担任了第六处（艺术处）处长。后来，第六处实际上成了全国抗敌文艺宣传的指挥部，田汉就是这个指挥部的总指挥，为抗战宣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田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对于我国的戏剧艺术，特别是现代话剧的萌生与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中国革命戏剧的一代巨匠，但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12月10日含恨而逝。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一大笔文化遗产，将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岳喜良）

文学家

——老舍

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人民艺术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市人。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由母亲抚养成人。1912年入北京师范学校，爱上了文学，1918年毕业，曾任北京十七小学校长，天津南开中学语文教员。1924年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在许地山的鼓励下开始写小说。6年中发表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1930年回国，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这期间写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创作经验谈《老牛破车》及《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7年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问世，这是一首“旧时代的葬歌”，小说通过一个健壮勤劳热爱生活的人力车夫祥子的一生艰苦挣扎以及最后堕落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万恶的旧社会，鞭挞了吃人的制度。小说被译成十几种外国文字，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抗战爆发后，老舍辞去教职，在党的领导下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率战地慰问团去西北慰劳抗敌将士。这一时期写了许多作品，有剧本《残雾》、《面子问题》、《张自忠》，长篇小说《火葬》，短篇小说集《贫血集》、《火车集》，诗集《剑北集》，通俗文学作品集《三四一》等。1946年赴美讲学，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1944至1947年，创作了百万字的著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应周总理之召，历尽艰险返回祖国，热情地投入各项工作，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并先后创作了《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等23个剧本，荣获“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此外，还写了不少报告文学、杂文、短评和通俗文学作品。创作了《无名高地有了名》，歌颂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英雄们的业绩，还翻译了肖伯纳的名剧《苹果车》，改编昆曲《十五贯》为京剧。

老舍一生写作勤奋，作品众多，被誉为文艺队伍中的劳动模范。他的作品语言朴实简练，通俗风趣，不愧为杰出的语言大师。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终年67岁。

教育救国

1918年6月的一天，北京西城护国寺小羊圈胡同里热闹非常，人们喜气洋洋地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贺喜。原来，他的“老儿子”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和另几名同学一起被京师学务局直接任命为小学校长了。这真是小羊圈胡同的一桩大喜事。据说，北京师范学校成立至今，学生毕业后直接做校长的事也还是头一回呢！

这一位因被任命为校长而轰动了整个小羊圈胡同的青年人，就是后来名满中外的著名作家老舍，那年他才19岁。

老舍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满族家庭里，是母亲 41 岁生下的“老儿子”。他出生不久，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父亲作为保卫紫禁城的一名“护军”，在作战中不幸被烧伤，惨死在一家粮店里，家中也被侵略者洗劫一空。北京城和家庭的这次灾难，由于母亲的无数次的含泪倾诉，在老舍童年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火种。

1906 年，母亲在亲友的帮助下把他送进了私塾，读“四书”、“五经”，后又转入小学。家境尽管贫寒，但他学习勤奋刻苦，门门功课成绩优异。风趣幽默的天性，坚强洒脱的性格使他在—群拖着小辫的男孩中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好友罗常培在《我与老舍》中说他“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而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1913 年，老舍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学校，5 年中他不仅学到了做一个教师必备的各种知识和技能，而且培养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志趣。和当时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老舍面对危亡中的祖国，萌发了民族自尊自强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是当时许我爱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目标。师范毕业后的老舍立志献身教育，小学校长的职务为老舍的勃勃雄心开辟了一条“教育救国”的可行之路，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

老舍工作的小学位于京师北郊一条较偏僻的街道，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他团结老师、爱护学生，很快就以他的不懈努力和以身作则赢得了师生的信赖和尊重，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老舍还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把从母亲那儿听来的及他自己耳闻目睹的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的事实讲给学生听。他那幽默的语调，风趣的谈吐常常使学生在一种“含泪的笑”中受到深刻的启迪，这时的老舍就已显露出了非凡的语言才能。短短一年多时间，老舍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受到同行的称赞。1919 年下半年，京师学务局选派老舍等几名优秀小说校长专程赴南方考察小学教育。一行人先后走访了南京、上海、镇江等地的 20 余所小学。考察活动使老舍的眼界大为开阔，对当时的国民教育状况有了较多的了解。考察结束，他们联名撰写了长篇考察报告。对教育方向、教学目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育现状等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发表了这篇考察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次考察更坚定了老舍“教育救国”的决心，他希望通过多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回校后，他立即补充修改了原有的规章制度，整顿校风，严肃校纪，对课目的设置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并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增设了民族知识，国史知识及时事新闻等方面的教育内容。1920 年 9 月，老舍以他卓越的办学才能被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所劝学员，管辖本区国民学校及小学教育。他到各校频繁巡察，上呈要求整顿校风校纪，取消不良守旧塾师，查办破坏学校教育的绅商恶霸。但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进入社会不久的老舍很快就觉察到在旧的机关里同道者寥寥无几，自己致力于教育救国的雄心和抱负在这种社会氛围里难以实现，学界官场的腐败和无聊又使他感到极度压抑和愤懑。两年后，他终于决然辞去了教育行政职务，不久就在一位英籍教授的推荐下，漂洋过海，到英国开始了他长达 5 年之久的异乡生活。

1923 年老舍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小铃儿》，就是以这段生活为基础写成的。

热恋故土

雾都伦敦，有一个小型的东方学院。20 世纪初期，这个学院中文部的汉语讲师舒庆春，在遥远的故国新文坛上开始引人注目——国内刊物上连载了他的 3 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老舍”这个名字不胫而走。大英帝国的首都，竟成了作家走文学之路的起点。

老舍 1925 年 9 月抵达英国。刚到伦敦，异国情调给了他许多新鲜的感受，但不久，现实的生活便使他感到了残酷与冷漠。东方学院中文部同行中有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但他连中文也读不通，实际上的教学担子全落在了老舍和另一位女教员身上。教学工作相当繁忙，而薪水却最低。老舍不得不过着艰苦的生活，一身冬夏常穿的洋服，袖口及肘部都磨得生出了亮光。住房和许地山合租，设备极其简陋，有时还不得不去住学生公寓。老舍后来胃病缠身，用他的话“这应由英国人负责！”

英帝国是最早使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者，也是 1900 年洗劫北京的主要元凶。生活在这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里，现实的体察勾起了老舍对历史的记忆，自幼被家庭和社会培养起来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立场，使老舍用一种犀利的目光深刻洞察英国的社会——这个靠资本剥削和殖民掠夺发达起来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到处充满铜臭，许多人被金钱蚀透了灵魂，一切行为无不以金钱为重心。种族歧视和虚伪的绅士风特别露骨，黄皮肤的中国人常常被人瞧不起。给老舍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在他住公寓时，有一次周末，人们大多数出去游山玩水，或看朋友。老舍既无游玩的兴致又举目无亲，因此打算呆在屋子里读书以消磨时光。按例，公寓里哪怕只有一个人，女招待也要留下侍候晚餐。老舍发觉只有自己在家，便深感不安，主动假说自己也要外出，好让这位年轻的女招待回去休息。哪知她竟不知好歹，趁机嘲弄老舍一番。这件事深深刺痛了老舍：祖国如此贫弱、她的子民虽是位高等学府的专家，却仍然受人家一个佣人的嘲弄！因此在老舍描写英国生活的小说《二马》里，“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偏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我怎样写 二马 》）。

艰苦的生活使老舍热恋故土，现实的体察使他眷恋祖国。老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历史和现实的画面叠印在他的脑海中，促使他用“一半笑一半恨地去看世界”的眼光观察社会现实，艰难地探索着国家强盛的良方。作为一个敏感而深刻的知识分子，老舍开始在业余时间里拿起笔来，用自己犀利的笔锋剖析人生、剖析社会。就这样，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产生了他早期的 3 部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

《老张的哲学》描写了一个叫老张的人的行为德性，讽刺和鞭挞了他的市侩哲学和无耻行径。老张的“哲学”就是一个字“钱”，他的所谓“钱本位而三位一体”，实际上是在铜臭气中将西洋恶秽与封建毒物混杂在一起。

《老张的哲学》中对老张一系列恶行的描写，无不围绕着一个“钱”字来进行，但实际上却是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一部分市井流氓和恶棍们劣迹的概括，有着极其深刻的批判精神。老舍曾在另一篇作品中严峻地指出过金钱主义那无孔不入的侵蚀力：“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象一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

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象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真是入木三分。《赵子曰》和《老张的哲学》几乎是姊妹篇。但不同的是作者对主人公赵子曰的行为虽给予批判，但对他的未来发展却寄予了满怀希望。

《二马》把两代中国人的形象置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环境中来描写，作者试图通过老马和小马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的一幕幕悲喜剧，比较中国人和英国人在生活习惯、心理特征等方面的不同，批判不列颠民族的偏狭观念和自大狂及英国的民族歧视政策，找出中华民族为什么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的根源，在于民族的劣根性——这一点与鲁迅几乎是相通的！指出：“一个民族有一种历史的骄傲，这种骄傲便是民心团结的原动力。”从而反映了作家强烈希望祖国富强的愿望及对于实现的清醒认识。这种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现实的深刻剖析形成了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国内文坛的注目。

1926年至1927年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趋向高潮，在伦敦，老舍和五六位不同专业的朋友组织了读书会。授课和写作之余，他们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经常在一起谈文学、谈政治、谈经济，也辩论哲学和人类等问题，更特别关注国内形势。国民革命军北伐，他们“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他们盼望着北伐成功，盼望着祖国强盛。长期的异国生活也改变不了作家对于祖国的一片赤诚。

1929年7月，老舍终于结束了他旅居伦敦5年的生活，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经欧洲大陆，在新加坡作了短时期停留后，于1930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开始了他辉煌的文学生涯。

（王运思）

绘画艺术家

——张大千

张大千（1899～1983），原名张正权，后改名爱、季、季爱，字大千，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四川内江市人。童年饱尝苦水，1911年进乐至县城小学读书，3年学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1914年到四哥张文修教国文的重庆求精中学求学。1917年前往日本留学，考取了京都艺专，学习染织，其间爱上了美术课。1920年回国，立志振兴中国书画艺术，先后拜著名书家曾农髯和李瑞清为师，在两位严师的指导下，他从双勾和临写“永”字、临摹清初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开始，扎扎实实地从头学起。后来又结识了著名画家黄宾红，开始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生涯。1927年至1930年他先后两次登我国著名的风景区黄山写生。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其它名山大川。从此，他以清新俊逸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跻身中国名画家之列。“七·七”事变后，素以豪爽好客、喜欢社交著称的张大千，忽然在北京销声匿迹多日，为的是不被日本侵略军所利用。1941年至1943年，他先后两次赴敦煌，对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著名朝代的壁画代表作及雕塑精品进行了临摹，并在兰州、成都、上海、东京等国内外城市举办了临摹敦煌画展览，每次都引起轰动，对保护和传播敦煌民族艺术瑰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8年去海外，先后去印度、迁香港、移巴西、赴美国。1978年8月居台北市双溪“摩耶精舍”。1983年4月在台北病逝。

张大千毕生献身于艺术事业，为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当今最负盛名的国画大师”。

绝不给日本人干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东郊外的芦沟桥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北京很快就落入了日本人手中。这时，张大千的家正住在景色秀丽的颐和园。有一次，在吃饭时，张大千对在座的客人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比四川的土匪还要坏。”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日本宪兵队长耳朵里，日本人以“诬蔑皇军”的罪名，把张大千关押起来。一个月之后，宪兵队没有网罗到其它“罪证”，只得释放了他。

回到家里，张大千不甘心困居北京当亡国奴，苦心思索着逃离的计划。不几天，几个汉奸又登门求见。原来日本人想利用张大千的名声，请他出任伪职。张大千听说后一阵大笑，并针锋相对地说：“我张大千是中国人，绝不给日本人干事！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那个汉奸见张大千态度如此坚决，只好灰溜溜地滚蛋了。最后，在北京任伪职的一位四川老乡“登门拜访”，用“关心”的口吻劝张大千归顺日本人。张大千深知这只日本狗的“良苦用心”，托故上海的一大批古画丢失，需立即去上海查明，谢绝了他的“好意”。

张大千拒绝出任伪职，又无心赏景作画，整天闷在家里，引起外界的种种猜测。有的说张大千被关押起来了，有的说张大千被日本人杀害了，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张大千在上海的一位学生，真以为恩师已不在人世，还郑重其事地举办了“张大千遗作展”。当时，上海的几家报纸同时报道了这一

消息。张大千得知后，灵机一动，想出一条脱身之计。张大千以“关系到艺术声誉之大事”为借口，向日本占领军当局提出了去上海办画展的要求。日本人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

到了上海，张大千衣着如旧，仍然留着长长的胡须，以此来迷惑敌人，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辗转回到四川。沿途他亲眼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心中感慨万分。到重庆后，他与二哥张善子一起作画，献画义卖，支援抗日战争，并联合举办抗日爱国流动画展。其中《怒吼吧，中国！》、《中国怒吼了！》等作品，充分体现了兄弟二人的爱国热情。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重庆人民的抗日热情。透过画面，人们似乎听到前为抗日将士奋勇杀敌的呐喊声，看到中国大地上升起的胜利曙光。

保护敦煌瑰宝

1941年5月，一队骆驼顶着烈日，在我国西北部戈壁滩沙漠地带艰难地行走着，放眼望去，尽是无边的沙石，人迹罕见。旋风也不知怎么那么高，一股股的，打着旋在沙漠上奔跑。骑在骆驼背上的张大千，随着有节奏的驼铃声，遥忆起敦煌莫高窟的悠悠历史……

很久以前的一个傍晚，有位高僧西游到敦煌城东南的三危山下，正当他四处寻找住宿的地方时，突然三危山的三座山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好象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高僧看到此景，认为这是上苍所赐的佛教圣地。于是，他就雇人开凿石窟，雕刻佛像。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就这样诞生了。从北魏开始，历代画家、雕塑家在这里留下众多的雕像和壁画，成为集中显示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智慧艺术成就的艺术宝库。清代年间，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鄂登堡等外国人先后窜到敦煌偷抢文物，发了横财。这时，藏经洞的文物已所剩无几了。

张大千到达敦煌时，满眼断壁残垣，下层洞全部被动土淹没，一片凄凉景象。开始，在莫高窟里，白天由其子提着马灯爬上梯子照明，张大千爬上另一个梯子用铅笔纪录，把塑像、壁画和题记全部记录下来。3个月的时间，仅记了四五十个石窟。每天晚上，回到住处的张大千烛光下作画，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冬天，张大千冒着刺骨的寒风对石窟编号，手冻疼了在火盆上烤一烤再写，共编了300余窟。

1943年6月，张大千第二次来到莫高窟，大规模地临摹壁画。他和门生们常常是蓬头垢面，清晨入洞，薄暮出洞，再开夜工，历时两个春夏秋冬，在丝绢和布匹上临摹出300幅壁画，最大幅的达几十个平方米。《张大千临摹壁画展》先后在兰州、成都、上海、西安、东京等国内外城市展出时，展览大厅人头攒动，盛况空前，每次都引起轰动。张大千这一爱国举动，是对保护和传播民族艺术瑰宝的巨大贡献。

至死不忘锦乡河山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寓居香港的张大千分外欣喜，出于对北京解放和对毛泽东的敬仰，他特意作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此画长132厘米，宽64.7厘米，图中，近景画的是两片繁茂的荷叶卓然挺立，中景画的是一朵白莲掩映于荷影之中。画面清秀，荷秀迷人，寓意生机勃勃，

万象一新。客观上，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后来，张大千托何香凝女士将此画带到了北平，转呈给了毛泽东主席。

张大千晚年，严重的糖尿病致使他的视力急剧下降。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对艺术的追求。1968年，他在巴西的八德国，创作了巨幅画卷《长江万里图》，长1997厘米，宽53厘米，自滋县至崇明，急流险滩，千山万壑，万里江山，集于一卷，充分表现了万里长江的雄伟气势。1981年8月，在台北市双溪摩耶精舍，张大千又作了长36尺、宽6尺的巨幅的《庐山图》，画面上山峦叠障，气势磅礴，显示出这位伟大艺术家气吞山河的胸襟和饱满的爱国热情。

叶落归根，漂泊海外多年的张大千乡恋之情与日俱增。他说：“外国的山水，我看了不少，看来去，还是中国的好！”他曾经数次写信和国内的亲友联系，流露出他回归祖国的想法。但是，十年“文化革命”打破他重返故乡夙愿，张大千忧心如焚，望大陆而兴叹。他只有把饱满的爱国热情寄托于诗画之中，“看山还是故乡青”、“半壁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成为张大千至死不忘祖国锦绣山河的真实写照。

1983年4月2日，春雨从灰蒙蒙的天上，从浓浓的云层里落了下来。中国台湾台北市笼罩在极大的悲痛之中。当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因病逝世。痛失巨匠，两岸同悲。海内外报纸纷纷刊登消息、唁电和纪念文章，悼念这位国画大师。人们不仅赞扬他一生杰出的中国画成就，更敬重他作为伟大艺术家的一幕幕动人的爱国故事。

（张健一）

文学家

——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字友三，号友山，后改名多，笔名一多、亦多。现代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出生在湖北浠水县一个“世望家族、书香门第”。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曾任《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编辑，并开始写白话诗。1922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及纽约学习，同时研究文学和戏剧。1923年第一本诗集《红烛》在国内出版，反映他的唯美倾向，但其中《太阳吟》、《洗衣歌》、《忆菊》等诗篇反映了他在美国目睹身历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激起的反帝爱国热情。1925年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加入了“新月社”和国家主义派“大江社”。1927年应邀去武汉任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股长。同年秋后，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当主任。1928年1月出版了颇有影响有诗集《死水》，表现出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憎恶与抗议。同年3月与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月刊。而后主要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先后任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等。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其间不仅研究了《诗经》、《楚辞》、《乐府》和《神话》，还研究了文学的起源发展及文化人类学。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论文集和《管子集校》。这是他10年研究的精品，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3年后，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民主运动，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昆明《民主周刊》社长，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站出来主持“民盟”的领导工作。同月15日，在“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愤怒指责、痛骂反动派，当晚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1948年由郭沫若，朱自清分别作序的《闻一多全集》四册八集出版，内容包括古典文学研究，诗歌创作、评论、杂文、诗选及校笺等，前附《事略》及《年表》。另有《闻一多选集》、《闻一多诗文集》。1980年，三联书店等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闻一多全集》（四卷本）、《天问疏证》、《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等。

显示中国人的骨气

1919年春天，帝国主义操纵的“巴黎和会”拒绝废除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国内的反动政府不但不反对，反而准备在条约上签字，北京的大学生震怒了，全中国人民震怒了。

在这关系祖国命运的严重时刻，就读于清华大学的闻一多在学生会的一次会议上，激昂地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难道清华真的不是中国人的学校吗？”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哽咽了。当天夜里，闻一多为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又悄悄地在饭厅门前贴了一份呼吁书，

并抄录了岳飞的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用岳飞的爱国精神来鼓励同学们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爱国斗争。

“呼吁书”象一把干柴，一触即燃。“进城去，上街去，打倒军阀！清除卖国贼！”同学们早已憋在心里的爱国之情洪水般地倾泄出来。整个清华卷进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热潮之中。在斗争中，闻一多负责宣传工作，他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忙着拟宣言写传单，有时连饭都忘了吃，组织上街的游行队伍，筹备召开反对卖国条约的示威大会。他对身边的同学们说：“清华的学生，要更显示出中国人的骨气来！”

在闻一多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时候，北京又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血案。1921年6月3日，李大钊和8所大学的教授、讲师、职员，上街游行要求北洋军阀政府补发欠薪，保证教育经费，结果遭到镇压。为抗议军阀政府的法西斯行径，北京的大中小学师生一致决定罢教、罢课。闻一多毅然参加了集体罢课、罢教等一系列活动。

闻一多的爱国行为，引起了校方当局的强烈不满。不久，校方宣布把参加罢课的学生“全体留级一年”，并在学生中分化拉拢，有些学生动摇了，退出了罢课、罢教的行列。是企求出国深造，还是坚贞爱国，闻一多和全班28名同学选择了后者。他大声疾呼：“爱国无罪！我宁肯被开除，也不愿玷污自己作为中国青年的尊严。”结果，闻一多被无理的“留级一年”。许多坚持正义的老师和学生都说，闻一多的“留级”，是光荣的“留级”，爱国的“留级”。

中华之恋

1922年8月，闻一多到达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科罗拉多和纽约的大学里学习美术。

在芝加哥学习期间，闻一多到设在林肯公园里的自然博物馆去游玩，发现二楼有一个“中国陈列室”。这使闻一多喜出望外，能在异国他乡看到祖国的风物，该是多么幸运的事啊！于是，他兴致勃勃登上二楼，一进门他就气坏了，越看越按捺不住心头上的怒火。原来，在这里陈列的，都是中国极其珍贵的文物，有秦代的陶瓷、石窟的经书、巨大的雕刻……这些都是中国的国宝啊！他实在憋不住了，气呼呼地问讲解员：“这些中国的文物是怎样跑到美国来的呢？”

“当然，是用金钱收买来的啦！”

“收买？金钱？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中国的宝物，是无价之宝！”

哦，不不，也许是中国人送给美国的吧！”那个讲解员结结巴巴地说道。

“赠送？应该说是掠夺！是抢劫！”

闻一多说完这句话，再也不愿在陈列室里多呆一分钟，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闻一多来美国是学画的，不久便觉得色彩和线条不能充分表达他对祖国的爱恋之情，因此把学习的重点转移到文学上，并开始进行诗歌创作，他怀念祖国，思念家乡，总忘不了受到蹂躏的大好河山。在《太阳吟》中，他写出了扣人心弦的诗句：

太阳啊，楼角新升的太阳！

不是刚从我们东方来的吗？

我的家乡此刻又都安然无恙？

当时，有些中国留学生迷恋美国的高楼大厦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一心想留居美国，不愿再回到中国去，谈起祖国来总是这也不好，那也落后。闻一多常常提醒他们：“中国人，要象个中国人！”还特地写了一首叫《我是中国人》的诗，来表示对祖国的深深的热爱，诗中写到：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大洋底度量，

春云底柔和，秋风底豪放！

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着！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投入战争

1925年5月，闻一多踏上了归程。轮船驶到上海吴淞口，他立即换上中山装，而把西服、领带抛进了大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清华、南开等大学迁到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闻一多在中文系任教。他一直期待着抗战胜利，可是国民党军队却是节节败退，这使他愤慨万分。

1945年8月14日，抗日战争胜利，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统一，但蒋介石却阴谋重新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为此，西南联大召开了一次“从胜利到和平”的晚会，会上，闻一多手握扩音器，大义凛然地警告企图发动内战的人说：“反动派，你听这些声音：‘人民不要内战，人民不要独裁，人民要民主，要和平！’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

后来，闻一多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在对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统区的对比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希望。1945年12月2日，国民党公然用枪弹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昆明学生，打死了4人，打伤了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同其它教授一起发表支持学生抗议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宣言。1946年2月，他以悲愤的心情，亲自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称“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同时，他坚定地表示：“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在四烈士殡葬的那天，闻一多神色严峻，并在葬仪上致词，用铿锵有力地声音喊道：“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要追捕凶手。要追他们到海角天涯，这一辈子追不着，下辈子追不着，下辈还要追，这血债是要还的！”

宁死不屈

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

闻一多抚尸痛哭，悲愤莫名。他明知国民党将要对他下毒手，仍然照常工作，毫无畏惧。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学校师生劝他暂避一时，他坚定地说：“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就停止工作，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

7月15日上午10时，民盟在云南大学召开李公朴死难报告会，请李夫人张曼钩报告李公朴被害经过。闻一多毅然出席，并即席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讲演。他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发生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要遭这样的毒手！……今天，这里有没有物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万人民！……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

大会结束后几个小时，闻一多不顾情势危急，到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同楚图南一起召开招待会，报告李公朴被刺经过及李公朴的生平。

下午5点多钟，记者招待会结束，闻一多由长子闻立鹤伴随回家，刚到家门，早就埋伏在那里的特务，突然从两头冲过来，向他举枪射击。就这样，这位伟大的民主战士英勇地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

闻一多被害的消息传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立即发电致哀。周恩来副主席正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他获悉此消息后，立即致电慰问家属，同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亲笔写了悼词。10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文化界纪念鲁迅大会演讲中指出：“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在人民面前宣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的指挥，做一条人民的牛！”

一个伟大的民主战士倒下去了，共和国的人民永远都没有忘记他。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闻一多拍岸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张建一）

京剧表演艺术家

——程砚秋

程砚秋（1904～1958），原名承麟，字菊侬，艺名程艳秋，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1904年元旦出生于北京一个满州贵族家庭。6岁时，经人介绍，拜正享盛名的刀马旦荣蝶仙为师学戏，正式踏入了京剧大门。后来，又投陈德霖、王瑶卿门下学旦角，对梅兰芳执弟子礼。从此得以在浩翰的艺术天地里展翅翱翔。1922年17岁时，他独立成班演出。程砚秋“文、武、昆、乱”一脚踢，使旦角表演艺术面貌焕然一新，大大震动了京剧舞台。他发挥表演艺术上的独创精神，兢兢业业，在京剧舞台上逐渐创立刚柔相济，婉转多姿，意境深邃，韵味隽永，思想性和艺术性并美而独树一帜的“程派”。1931年，曾担任南京戏曲音乐学院的副院长。

解放后，程砚秋在生命的最后9年中，一直活跃在祖国的京剧舞台上，为新中国“载歌载舞”。1955年1月，由周恩来、贺龙介绍，程砚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富有爱国精神的名伶，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程砚秋不仅在艺术上成就非凡，而且有较强的戏剧社会责任感，1931年12月5日，在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演讲《我之戏剧观》，着重谈了戏曲艺术对社会的责任，他说“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他主张通过“高台教化”去启发观念“观今鉴古”，影响观念的思想和行动，促使“社会进化”，“提高人类生活目标”。从1923年到30年代初，他“对于现时社会之病症而下药”，演出了20多出“程剧”，如《梨花记》、《红拂传》、《梅冢》、《金锁记》、《梅妃》、《文姬归汉》、《祈祷和平》、《春闺梦》、《亡蜀鉴》等，反映人民的不幸，控诉一切封建压迫，赞扬人民反对一切罪恶的斗争精神，从而激发、振奋人民的抗暴斗争。

自30年代来，程砚秋曾去欧洲考察，先后访问过苏联、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家，把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介绍给世界人民，为祖国京剧艺术的继承和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民族气节

程砚秋，这颗本世纪中国京剧戏坛光彩夺目的明星，1910年仅6岁就开始了京剧舞台生涯。20年代独树一帜，人们称之为“程派”，1932年在上海一次公演时，观众送给他一幅红缎幅黑绒字的贺联：“艳色天下理，秋声海上来”来赞誉他精湛的艺术表演，那时，他才19岁。

但是，更难能可贵的，他还是一位高风亮节的爱国者。

“轰”！“轰”！1937年，卢沟桥上响起炮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北京城。刚刚带着剧团从外地演出归来的程砚秋，发现整个北京变成了一座“死城”，商店都关了门，学校也停了课，街头巷尾不时传来占领军杂乱的皮靴声、马蹄声……

没过多久，日本侵略者强迫北京的“梨园公益会”，拉一些京剧演员组织义演，并要求程砚秋参加他们的演出，把演出收入用来为日本人捐献飞机。这样一来，既可以为他们制造“天下太平”的假象，又能白白捞到大笔款项

购买飞机，用来继续屠杀中国人民。

“梨园公益会”是当时戏剧界的一个组织。他们不敢违抗日本侵略者的命令，只得勉强答应。作为艺人又有谁敢说不唱？不唱就是有意与皇军对抗。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下，有些艺人被迫同意登台，但程砚秋刚正不阿，临节不辱，断然拒绝为日本侵略者粉墨登场。

北京梨园公益会怕惹来更大的麻烦，只得托人到程砚秋的住处说情：“程先生，您给圆个场，体谅体谅同行的难处，就答应了吧！”

来人向程砚秋说明了来意。程砚秋直截了当地说：“同行有难处，我知道。可是我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不干！”

来人见他语气坚决，很难说通，皱了邹眉头，说道：“唉呀，程先生，您别这么说。您是大名角，您要是不唱，日本人那里惹不起呀！再说对整个京剧界都不利！”

程砚秋思索了一下说：“我程某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让大家受连累。请你转告日本人，甭找京剧界同行的麻烦。我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唱义务戏买飞机的事，我宁死在枪下也决不从命！”

来人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悻悻而去。

程砚秋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了结，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但他已下定决心，不管怎样也不能丧失民族气节，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怒击敌寇

程砚秋罢演，使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但他们知道程砚秋的名望很高，不能随便加害于他，只好以后寻机报复。

1940年至1941年间，程砚秋应上海黄金大戏院邀请，赴沪演出程派名剧《锁麟囊》等，表示对困居“孤岛”的上海人民的慰问。

这两次演出，使日本侵略者更为恼怒。他们想，程砚秋在北京罢演，却两次赴上海演出，这不是存心和大日本帝国作对吗？一定要惩治程砚秋，给他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大日本皇军不是吃素的！

有一次，程砚秋在上海演出之后返回北京，在前门站刚一下车，事先守候在那里的便衣特务和警察就把他围了起来。

“喂，你是程砚秋吗？”

“你们要干什么？”

“跟我们走一趟，检查检查！”

程砚秋心里非常明白，这是对他罢演的报复，只好跟着他们来到站内偏僻处的小拘押室。刚一进屋，几个敌伪特务故意找碴，有个宪兵就动手搜程砚秋的身，程砚秋意识到“检查”是借口，实际上是要害他。“卑鄙至极！”程砚秋一时怒火冲天，他想：不能这样白白受坏蛋们的欺辱，要反抗，要还击！一抬手就使那个搜身的宪兵扑通一声仰面朝天。这一来可惹恼了那个宪兵，他急忙从地爬起来，象恶狼似扑向程砚秋。同时，20多个宪兵、特务一拥而上，将程砚秋团团围住，拳打脚踢，还想把他捆绑起来。但这帮家伙哪里知道，他们面前这个文弱书生似的京剧演员，武功根底扎实，一群人竟对付不了他。

这时，只见程砚秋倏地跳到屋里的一根立柱前，背靠支柱，趁特务、宪

兵人多施展不开之机，挥舞拳手，左右开弓，把七八个特务打得纷纷后退，不得近身。程砚秋乘这个空隙，跃身过去，一掌击倒迎面过来的一个宪兵，跳到屋外，奔向月台，飞快地闪到车站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之中。等到特务追上来时，程砚秋早已不见踪影了。

程砚秋赤手空拳，怒击敌寇，显示了中国人民的铮铮铁骨，北京城内闻者无不称赞！

罢唱归田

程砚秋虽然逃出了虎口，但他的剧团从上海运回来的戏箱子，却被宪兵和特务的刺刀捅坏，唱戏用的锣鼓也被用刺刀捅破了。戏是没法唱也不能再唱了，只得卸装回家。就这样，日本侵略者还不死心，他们步步紧逼又采取了新的花招。

程砚秋回家没几天，日本宪兵队长气势汹汹亲自找到报子胡同程家，程砚秋拒不出见，叫他的夫人果素英挡门。

“你们来有什么事吗？”果素英冷冷地问。

“当然有事，要见程砚秋。”宪兵队长恶狠狠地说。“他有个《春闺梦》的剧本，请你把它交出来。”

“我不知道剧本在什么地方，等他回来你们再来拿吧。”

周旋了半天，宪兵队长碰了一鼻子灰，一无所获。上级没有下达搜查命令，他只得退了出去。

北京城处处都在魔爪铁蹄之下，环境越来越险恶。程砚秋不愿媚敌当顺民，便与夫人商议，决定罢演归田，绝迹舞台，到北京西郊的青龙桥隐居，荷锄种田。当时梅兰芳在上海蓄须明志，罢演绝唱，以示对敌伪决绝。两位艺术大师的高风亮节，南北辉映，一时传颂。

程砚秋隐居青龙桥，每天扛着锄头下地，象农民一样播种犁田，锄草施肥。秋收时节，他把妻子和孩子接到乡下，让他们品尝自己亲手做的玉米面贴饼子。于此同时，他还坚持每天练功，农闲时读史习画，也时常和农民一起拉家常。

一个著名的京剧表演大师欲演不能，程砚秋内心深处痛苦万分，日子越过越艰难。但不管别人怎么劝，程砚秋总不肯离开青龙桥，“身居野外乐融融，趣在农民不忘苦”，他有自己崇高的追求，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然而，青龙桥的生活并不平静，敌伪仍然没有放过他。什么警察局啦，什么治安军啦，常来程家查户口，还跟踪追击，窜到青龙桥搜查。每次总见程砚秋扛着锄头，啃着窝窝头，查不出名堂来，才败兴而归。1944年初春，日本宪兵想乘大逮捕的机会，把他抓进牢房。一天半夜，他们越墙进入程家，企图搜点“罪证”，好作为逮捕的借口，结果什么也没捞到。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有人经受不住这种压力，程砚秋顶住了！有一次，夫人果素英到青龙桥去看他，他极为愤慨地说：“不用怕！我就在青龙桥等着了，哪里也不去，他们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国破家亡，个人安危又算什么！让他们来吧！”为保持人格节操，程砚秋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1949年初，程砚秋以万分喜悦的心情，迎来北京的和平解放，从此他重新登上京剧舞台，为新中国、为自己的人民载歌载舞。1957年11月，他由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富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戏坛明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根据他多年的思想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

（张建一）

文学家

——丁玲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姿，曾用名蒋伟、丁冰之。笔名丁玲、彬藏、丛喧等。现代著名作家。1904年生于湖南省临澧县。她幼年丧父，跟着当小学教员的母亲辗转飘流，在具有浓厚民主主义思想的母亲教育、熏陶下，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后又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1921年到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平民女校。1924年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她怀着对社会人生的愤怒与鄙视，从1927年起陆续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以现代女性的精神苦闷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受到社会和文艺界的注目。1928年与胡也频、沈从文组织红黑社，并出版了《红黑》半月刊。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后又出版《自杀日记》、《一个女性》。1930年在上海参加“左联”，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其间写了中篇小说《韦护》、《水》等作品。1931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左联”的党团书记。1933年开始写作并陆续发表长篇自传体小说《母亲》。同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在南京囚禁3年之多。1936年秋，由于党的帮助，辗转到达陕北苏区。曾任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中国文艺协会主席、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及文学杂志《长城》。1941年写短篇小说《在医院中》、《田宝霖》等。194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等。1946年到华北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创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是一部土地改革运动的史诗，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1948年底去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大会，被选为该会执行委员。1949年到捷克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出版散文集《陕北风光》。

全国解放后，丁玲历任全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在黑龙江、山西等地农村度过20年劳动及被监禁的生活，留下了20多年的文学创作空白。1978年回到北京，次年被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邀请，去美国访问。1986年被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还出版了《丁玲近作》、《生活、创作、修养》、《我的生平与创作》、短篇小说《夜会》及《访美散记》、《丁玲戏剧集》、《丁玲选集》、《丁玲散文集》、《丁玲短篇小说选》、《丁玲中篇小说选》、散文《“牛棚”小品》等。1986年3月4日，一代文豪丁玲殒落了，终年82岁。

丁玲逝世后，文化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国丁玲研究会”；《丁玲研究丛书》创刊；《丁玲研究论文集》选编工作正在进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她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黑暗中前行

多少年岁月弹指间逝去，多少人瞬间青丝成白发，大自然的法则谁也违抗不了。丁玲病危住院，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那烟雾迷朦的岁月，那凄风

苦雨的年代，那邪恶者狂舞，善良者遭难的特殊的历史关头，一年年，一幕幕，在她记忆的海洋里，时起时伏……

1908年的秋天，刚满4岁的丁玲失去了父爱，怀孕在身的寡母只好带着她飘流他乡，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幼弟降临不久又不幸夭亡。丧夫、失子接二连三的打击，没有使她的母亲倒下去，她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女儿身上，带着幼小的丁玲艰难度日，四处求学。

在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中，丁玲结束了她的中学生活，考入了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校。后来，她和女友王剑虹先到南京自修文学，后又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由于王剑虹的不幸病逝，丁玲悲痛地告别了上海，转赴北京，成了一个半流浪性质的清苦的“公寓大学生”，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

社会的黑暗，无政府主义者的叫嚣，经济生活的贫困，使21岁的丁玲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就在这时，胡也频这个学徒出身的小说作者闯入了丁玲的生活。丁玲被他那倔强的性格和富有浪漫色彩的生活经历所深深吸引了。1925年的秋天，胡也频同丁玲结为夫妻，真诚而热烈的爱情温暖着两个年轻人的心，从此，他们并肩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27年12月，丁玲的处女作《梦珂》问世。次年2月，她的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小说月报》的卷首推出。这篇小说的问世，给丁玲带来了荣誉，也奠定了她的文学地位。1928年10月，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出版，这一书名，代表了丁玲这个时期的苦闷、奋斗和挣扎。1928年冬到1930年，丁玲陆续写成《客》、《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等10个短篇，这些小说缺乏一种艺术的完整性，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在黑暗中前行的丁玲，遇到创作上的第一次危机。

危机往往可以成为起死回生的转机。长篇小说《韦护》和中篇小说《一九三〇春上海》的相继发表，使丁玲很快成了名噪一时的左翼作家，并跨进革命文学家的行列。从1931年春胡也频烈士遭害到1933年夏丁玲被捕，短短的两年，她创作了长篇小说《母亲》和《水》、《田家冲》、《法网》等15个短篇。上海抗战后，她与鲁迅、茅盾等40多名进步作家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法西斯暴行。同年3月，丁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奔向解放区

1933年5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丁玲在上海被捕。一时间，左翼文坛以及进步文艺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纷纷遣责国民党特务绑架丁玲的罪恶行径。对于这一切，国民党当局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他们偷偷地把丁玲押到南京软禁起来。于是，丁玲“遇害”的消息便盛传起来。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左联”发起了悼念丁玲的活动，鲁迅和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为了扩大影响，鲁迅建议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还亲自安排把稿酬寄到远在湖南的丁玲的母亲蒋慕唐老人手中。

不过，这一次丁玲并没有死，经过地下党组织和各界人士的大力营救，她逃离了南京，潜回到上海，转赴陕北解放区，就这样，丁玲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

讴歌工农兵

1936年11月中旬，丁玲安抵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热烈欢迎。随后，丁玲到达甘肃前线，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这时，她与成仿吾、徐梦秋等人开始了陕北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的筹备工作。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11月下旬，陕北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文协）在保安正式成立了，丁玲当选为文协主任。文协成立后，与徐梦秋等人一起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编稿之余，丁玲经常到部队调查、采风。先后撰写了《保安行》、《北上》、《南下》、《鼓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作品，热情地歌颂了红军将士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七·七”抗战的炮声，激荡着亿万中华儿女保卫祖国的热肠。在延安一片沸腾的抗日救亡情绪中，归属八路军总部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丁玲被任命为团长。由24岁英姿飒爽的男女青年团员组成的“西战团”，9月22日从延安向东出发，在平渡渡过黄河，于10月12日到达山西省会太原。次日，丁玲在山西大礼堂发表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呼吁各界支持“西战团”的工作。太原失守后，西战团辗转活动于太谷、临汾等十几个县市，行程数千里，演出百余场，受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

当丁玲率团折回西进再渡黄河转往西安时，战局日趋紧张，日寇逼近潼关。西安古城兵慌马乱。西战团在丁玲的率领下进入西安。丁玲奔忙于各种各样的招待会、纪念会、座谈会，走访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的重要衙门，阐明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和西战团的宗旨，取得各界群众的支持，争取演出权利。

1938年7月，西战团顺利完成3次公演任务，告别西安凯旋而归。从出发到返回，丁玲整整度过了一年戎马生涯。这一年，对丁玲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是光辉灿烂、有声有色、硕果累累的一年。回到延安，她先后写了《压碎的心》、《新的信念》、《县长家庭》、《入伍》、《霞村》等七、八个短篇。不久，丁玲在毛泽东同志“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深入工农兵”的号召鼓舞下，更加坚定地走向工农大众。从《十八个》开始，到《躲飞机》为止，她先后撰写了《二十把板斧》、《田保霖》、《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袁广发》等十几篇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生动塑造了边区各条战线英雄人物的形象。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后，毛主席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上说这是丁玲写工农兵的开始，应为她新的文学道路庆祝。毛主席还为此约丁玲吃了一顿饭，席间，赠给她一首热情洋溢的词，词的下片是：“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历史的误解

1954年秋，丁玲光荣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代表，并出席会议。这年冬天，她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苏，参加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于1955年2月在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关于参加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情况汇报。紧接着，又发表了《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点感

想》。但是，这年秋天，就被错定为“丁、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可到了1957年，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袭来，不由分说，丁玲又被打成了文艺界的“最大右派”，落入了命运的谷底。

“反右”刚刚开始，丁玲在延安时早已做过结论的历史问题又被抖落出来。有一次，她去妇联开会，一群女工包围了她，骂她是叛徒，让她有口难辩。就这件事，丁玲回到家里整整哭了3天。她能不哭吗？对一个毕生都在以自己的坦白感召人民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难过的事吗？

那场政治风暴过去之后，丁玲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一切职务。1958年，她和丈夫陈明一同被送到北大荒“汤原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在这漫长的2900多个日日夜夜里，丁玲接受了生活的艰苦磨难，她当过职工文化教员、编过壁报、黑板报，饲养过鸡。面对“革命群众专政”，丁玲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念和对党的期待，她相信，8年的冤屈终有昭雪之日，她终究会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她从未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的文学事业。劳动改造之余，她一直在续写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并写了大量札记。

1966年“文化革命”，这场中国大地上的大劫难开始了，丁玲和丈夫陈明即被作为“牛鬼蛇神”关押进了“牛棚”，夫妻隔离，家中所有的文稿、资料也统统被洗劫一空。1970年4月，丁玲夫妇被林彪、“四人帮”投入北京秦城监狱达5年之久。获释出狱后，又被作为“危险人物”遣送到山西省长治市附近一个叫漳头的村子落户。在这里，她们一直住到1979年初。

80年代的春风吹散了丁玲心头的阴云。1980年1月25日，党中央批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长期压在丁玲身上的沉重枷锁，终于被彻底打碎了。76岁高龄的丁玲又重返文坛，开始了新的文学长征。她要追回逝去的岁月，她胸中有说不完的话。她要发表她那《在严寒的日子里》，她要完成北大荒人的余辉写照《杜晚香》，她要实践自己的诺言：“奋起我最后的余力，为党、为人民、为人类的未来……”

1986年3月4日上午10点45分，一代文豪丁玲殒落了。世界文坛为之震惊。生前，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证书寄到木樨地丁玲寓所，是北京时间3月25日，晚了21天。

（张建一）

音乐家

——冼星海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出生在珠江边一个贫苦渔民家庭。他的先辈是南中国江海上的水上渔民，到了他祖父一代才移居到澳门这块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霸占了上百年的地方。他的父亲冼喜泰，虽然定居在岸上，可还是操的水上祖业，生活的艰辛使他在40岁壮年时就去世了，当小星海呱呱坠地时，他已辞世半年了。寡居的母亲黄苏英只得抱着襁褓中的儿子与冼星海的外祖父相依为命。冼星海6岁时母亲省吃俭用，靠帮佣的微薄收入，才勉强使冼星海得以上学。然而冼星海更爱渔民在闲暇时吹弄的乐器，在这里，他受到了音乐的启蒙教育。

1918年，13岁的冼星海随母回广州定居，进岭南大学附中读书时，就加入了岭南大学学生业余管弦乐队，学会了吹单簧管和拉小提琴，并兼任过乐队指挥。1926年，冼星海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开始系统地学习小提琴和作曲理论，后因学校解散而辍学。1928年秋，他又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继续半工半读。不久，该校改组，冼星海再度中断学业。面对挫折和艰难的生活环境，冼星海并没有动摇学音乐的志向，他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投考世界著名的音乐学府——巴黎音乐院。

1929年冬，身无分文的冼星海，在一位同乡海员的帮助下来到法国。193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音乐院作曲班，开始了艰苦的工读生涯。1935年，冼星海完成学业后，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许多战歌。1938年11月3日到延安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拉开了他作为革命作曲家的真正序幕。

1939年，毛泽东主席单独会见了冼星海。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14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他接受党中央委托，与袁牧之一起去苏联完成抗日纪录片《八路军与老百姓》的作曲配音任务。1945年，他在弥留之际创作了《中国狂想曲》。不幸于同年10月病逝于苏联，享年35岁。

冼星海作为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敬爱的周总理为他的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是最中肯的评价。早在法国求学期间，他就写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风》和《朔拿大》，特别是《风》影响很大，受到世界著名音乐家普罗科菲叶等人的赞赏。巴黎音乐院给了冼星海“荣誉奖”。1935年回国后，他写出了许多优秀歌曲。如为上海学生界谱写的《我们要抵抗》，是他回国后创作的第一首救亡歌曲。不久，他又完成了《战歌》、《救国进行曲》、《青年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并为一些进步影片谱写了主题歌，如《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等。“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他勇敢地担当起为著名抗战戏剧《保卫芦沟桥》作曲的任务。他还来到煤矿区，与工人一起下矿井体验生活，为工人们谱写了《起重匠》。先后创作的《到敌人后方去》、《工人抗战歌》、《游击军》、《保卫武汉》等歌曲，感情充沛，技巧熟练，因而流传很广。在延安期间，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他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的问世，是他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音乐创作获得成功的标志，也是他非凡艺术才华和艰苦劳动的结晶。它的思想内容正如他对延安的青年们所说的：“这是一首对

于祖国的颂歌，我希望你们能够从每一个爱国者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这个方面来理解它。”

居异乡，未敢忘忧国 国弃民，民仍思效国

冼星海旅居巴黎的6年，其中大半时间与其说是为艺术，倒不如说为生存而挣扎着。他把呼吸凯旋门广场上的寒冷空气当作饮“醇酒”，喝塞纳河里的流水作为喝“乳浆”，他多次在梧桐树下饿晕了过去，几乎要被警察送进陈尸所。但奇异的生命之火在这个精壮的渔民之子身上终未熄灭。他活下来了，夹着那须臾不离的小提琴，跑遍了码头、市场、失业登记处……寻找一切他所能做的工作。生活是这样严峻而悲苦，但他始终没有一天忘记音乐，没有一天不记挂着遍体鳞伤、千疮百孔的祖国。

那是他考上巴黎音乐院以后的事了。那时学习异常紧张，冼星海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工挣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依靠一些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帮助来维护学习生活。昂贵的学习费用更加重了他的负担，一本乐谱、一卷谱纸往往要花去他可以维持一两个星期的生活费用。这时，他不得不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把乐谱、书籍买下来。

一天，他又没有饭票了，在一叫古久里的法国朋友家吃饭。这位法国朋友说：“为什么不到你们大使馆请求政府补助呢？”冼星海犹豫了。古久里认为他有别的想法，继续说：“以你的成绩和资格来说，是应该得到公费的，你们的政府怎么可以不管呢？”在古久里的帮助下，冼星海决定去试试。这位巴黎音乐院高级作曲班的学生（第一个中国学生）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和巴黎市长赫里欧亲笔签字的证明材料来到了中国大使馆。可是接待他的那位穿着考究的年轻官员看了看介绍信和证明材料，打着哈哈说：“光荣、光荣，这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崇拜、崇拜……不过……然而……这个……这个要请示大使。大使回国了。不过，你等着我们的通知，大使一反任，我们马上考虑你的事。”说完，这位官员又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眼这位衣冠不整的来访者。

冼星海满怀希望地走了。

随后的几个月，冼星海又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奔波了几次，可以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个个破灭了。最后这场“持久战”的结果是那么令人失望：自费出洋求学，概由个人负责，所举理由不充分，应毋庸议……”法国朋友感到此事真是不可思议，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代表母亲的作出令人难以接受的决定，然而母亲并没有嫌弃我呀！”冼星海这样想。

通过电视，冼星海看到了东北三省的沦陷；祖国水灾；流离失所的饥饿的同胞；黄包车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国民党的大屠杀……一桩桩、一件件，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一股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同时也坚定了他学成回国后为救亡斗争而贡献力量的决心。然而，对他触动更深的却是法国人民欢庆国庆的场面。那是1932年7月4日，他和朋友去看法国国庆节大游行法国群众热爱祖国的狂热场面，使他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时，冼星海似乎听到了祖国的叹息，民族的呻吟，母亲的低唤。“我要回去，去拯救我的祖国。”冼星海在心底大声呼喊。

是志士，一颗丹心只为国
真仁人，岂被金钱所诱惑

1935年仲夏，冼星海舍弃了继续留在巴黎获得更大成功的生活道路，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回国后，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中华民族的觉醒，从而受到了震动和鼓舞。

这年冬天，北京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救亡运动像烈火燃遍全国。充满爱国热情的冼星海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运动的行列。有人知道他是音乐家，给了他一首歌词，他只用了5分钟时间，倚墙写了曲谱。过了半点钟，在游行队伍中便响起了高亢激昂的歌：“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歌声像电波一样，不久就传遍了全国。

冼星海由此出了名。随后，他又写了《战歌》和《救国进行曲》等作品，被百代公司灌制成了唱片。百代公司也因此而发了财。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干涉，冼星海的唱片底版被销毁了，不能继续出版，他的经济也因此拮据起来。一天，以营利为目的百代公司老板签署了一张数额诱人的支票，找到了冼星海说：“我们是办文化实业的，不过问政治。我们聘请你为音乐部主事人，不过要接受公司的指导，为指定的歌词配音乐谱子……”随后，经理拿出一叠注满符号的唱片目录。冼星海接过来一看，全是那些风靡一时的黄色下流歌词。冼星海看得两唇紧闭，老板认为他默许了，继续点着头说：“当今这样的歌最好，能赚大钱，你也可以……”

不等老板把话说完，冼星海气得扔掉支票，但仍不失礼貌地说：“你认为艺术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吗？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并不这么看。有的时候，一个艺术家宁愿饿死，也不写违背自己良心的作品……”

说完，拂袖而去，掷给了目瞪口呆的老板这样一句话：“我要把全部精力投入救亡歌咏运动中去。”

冼星海说到做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的伸入，抗日战争终于在1937年的秋天爆发了。此时，冼星海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抗战运动，与同志们一起组织起宣传和支前的队伍。歌曲在这时也更高地发挥了它的号召、鼓动和组织作用。冼星海在这些日子里忙得更是不可开交，写歌、教歌、参加艺术界朋友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赞美祖国的新生，赞美各党派的团结和人民的觉醒。

是真金，岂怕烈火炼
谱战歌，英名垂青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更加残酷，敌人更加猖狂。但我们一定会胜利的，这一点冼星海是毫不怀疑的。他一面废寝忘食地工作，一面又向着新的、更高的理想迈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用歌声推动抗战的深入，冼星海决定：离开武汉到延安去。这时有人劝他说：“延安那地方很苦，整天吃小米。乞丐要饭都不愿到那里去，你这音乐家会受不了的。”

“正因为那地方苦，我才要去锻炼思想、锻炼革命意志。”

“听说那地方只讲政治，不讲艺术，一天到晚开会，这对你的创作是很不利的。”

冼星海反驳说：“讲政治有什么不好？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也不会有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作品问世。”

1938年11月，冼星海怀着一颗追求真理，参加革命的决心，携新婚妻子，装扮成商人模样到达了延安。

在延安，革命的理想、革命的意志，把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在这里，冼星海如鱼得水，创作激情也更加旺盛了。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完成了6部大合唱、两部歌剧、一部交响乐、几十首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至今仍家喻户晓的张光年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谱写的曲子。在那烽火遍野的艰苦岁月里，冼星海仅用了3天就谱完了全部的乐章。这部作品写的是黄河，歌颂的是黄河两岸的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风在吼，马在叫……”直至今天，每当听到这雄浑悲壮、高亢激昂的歌声，仿佛又把我们带到当年解放区人民波澜壮阔的斗争之中，那澎湃的战斗情绪正象黄河的滚滚流水和起伏的波涛，展现在每一位听众的面前……

在延安，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许多会议他要代表一个方面出席，作报告、写文章；作为音乐家，延安其他一些干部学校的音乐课程和歌咏活动，他是积极的支持者，每星期总要有两三次跑出20里地从事这些活动；他的新作品第一次演出，常常是由他担任指挥；同时，他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在培养青年干部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苦吧？累吧？当然。但这正实现了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夙愿。由于长期从事繁忙的工作，冼星海积劳成疾，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那年10月30日病逝于莫斯科。

岁月流逝，英名永存。冼星海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我们谱写的一曲曲战歌，连同他的英名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正如周扬同志对冼星海所评价的那样：“他的作曲曾激励千百万人民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生产劳动而英勇奋战；它们是抗战的号声，是生产的合唱，是英雄主义的颂歌，不但响彻于一时，并将流传于永世。”

王清兰)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艾思奇

艾思奇（1910～1966），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名李生营，云南腾冲人，其父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军人，曾任蔡锷领导下的讨袁护国军秘书长。艾思奇中学时代即参加革命活动，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参加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九·一八”事变后弃学回国，1932年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参加反帝爱国大同盟。1934年在《读书生活》杂志发表《大众哲学》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有较大影响，起到哲学启蒙作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37年任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出版《哲学与生活》、《实践与理论》及与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等书。1937年到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任哲学教员，并先后担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当选为中共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曾作为高等学校哲学课教材。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等，在哲学界有较大影响。其主要著作编为《艾思奇文集》（两卷）出版。周扬同志为文集写了序言。

艾思奇于1966年3月2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勤奋的“大众哲学家”

1931年9月18日，日军罪恶的铁蹄踏进了我国的东北三省，隆隆炮声震撼了中华大地。当时年仅21岁的艾思奇正在日本留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他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强邻虎视，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秋，血性男儿，怎能面对国难无动于衷？他毅然放弃了学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来到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艾思奇关切地注视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回到祖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反帝爱国大同盟，呼吁抗战，反对暴行。1932年他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不仅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而且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示威，慷慨陈辞，发表演讲，指斥日寇侵华暴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与此同时，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武器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用哲学的观点和眼光去观照客观事物，走上了哲学研究之路。

艾思奇是云南腾冲人，他的家乡虽地处边陲，但并不闭塞。艾思奇的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型军人，曾做过讨袁护国军的秘书长，看问题相当敏锐，思想也很活跃，平时言谈颇富于哲理性。艾思奇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在读书之余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和先进理论，加之他又秉承了父亲的特质，所以在中学时代就对哲学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对2000年前公孙龙子的

“白马非马”论做过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认为此论题之所以在当时惊动过世人，“原因是由于他（公孙龙子）第一次揭示了在日常生活里谁也不注意的人类思想之矛盾性，他将认识内容的具体的东西与抽象的东西分辨开来，而发觉两者间的对立的契机。”论定公孙龙子“显然是一个中国的形式伦理学者，以同一律作为他推理的至上公律……”由于他思维的深邃和敏捷，被同学们公认为是班上最聪明的人之一。

中学毕业后，艾思奇漂洋过海去日本留学，象当时的大多数有志青年一样，希望学得知识和学问，以报效祖国。在日本，他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从东京回到上海之后不久，他很快便结识了当时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田汉、周扬、周立波等。周扬曾经到他工作的《读书生活》杂志社专程拜访了他，并作了亲切的交谈。周扬对艾思奇的进步活动及他发表的一系列哲学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而艾思奇也对周扬十分佩服和敬慕。1935年，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周立波和周扬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一时期，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进步文化界同仁的帮助和支持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抽象作用与辩证法》、《进化论与真凭实据》、《理知和直观之矛盾》和《从新哲学所见的人生观》等一系列发表于当时各报刊上的文章和论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很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1934年在《读书生活》杂志一、二卷连载的《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一文，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起到了启蒙作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此文后来出版单行本，仅解放前就出过32版，流传很广。尽管作者在“四版代序”（关于《哲学讲话》）中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就没有想到要它走到大学学校里去……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但这部《大众哲学》却一版再版，受到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欢迎。

在旧中国的哲学界，艾思奇的哲学研究是独树一帜的。他30年代初期在上海发表一系列哲学论文，“或则用深入浅出的道理教育青年，或则向着种种错误的思潮开火……这些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周扬《艾思奇文集·序》）1937年，艾思奇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毛泽东同志曾对艾思奇所写的《哲学与生活》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在详细批阅之后亲自摘录其中重要章节，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商讨性意见。

全国解放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了新的贡献。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及一些哲学理论文章，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艾思奇数十年如一日，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他治学勤奋，文风明快，给中国的读书界留下一批丰富的文化遗产，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王运思）

作曲家

——聂耳

聂耳（1912～1935），中国现代著名作曲家，擅长演奏多种民族乐器。原名守信，号子义（一作紫艺），云南玉溪人。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一个清寒医家。父亲聂鸿是当地中医师。聂耳4岁丧父，其母彭寂宽以经营小药材店和做女红所得的微薄收入抚养儿女成长。

聂耳的童年是云南省这个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之乡度过的。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使他自幼喜爱上了音乐，在民族音乐的熏陶下，聂耳的艺术才能得到很大的发展。

1925年，13岁的聂耳在云南省昆明市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这时，正是中国大革命的前夜，新的革命思想、文艺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正在中学读书的聂耳开始受到新的革命思想、文艺思想的感染。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他参加了很多戏曲、音乐活动，演出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唱过革命歌曲《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工农兵联合起来》等。

1927年，聂耳考入了云南省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接触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开始在团的外围参加读书会，研究社会科学和文艺思想，参加音乐、戏曲演出活动，秘密散发革命传单。1928年秋，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共产党员李国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秘密活动，并开始初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1928年末至1929年4月，聂耳曾一度参加了“十六军”，以后不久，就借着军队溃散的机会于1929年5月又回到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原来的班级学习。

1930年7月，聂耳在学校受到监视，为了更好地斗争，他曾一度短时隐匿，但由于叛徒的告密，他不得不离开云南，来到上海。先在云南人开的一个小店里当店员，以此维持生活。同年10月，由同乡郑雨生介绍加入了“上海反帝大同盟”虹口区的组织（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工作，多次参加抗日游行活动。1931年3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社”，同年4月22日，任这个歌舞社的乐队成员，开始了职业音乐家的生活。

1932年4月的某一天，党组织通过剧作家田汉找到了聂耳，向他伸出了挚爱的手，帮助他迅速成长。从此聂耳开始以音乐为阵地，以论文为投枪，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一连串的进攻。这期间，他发表的论文有：《黎锦晖的‘巴蕉叶’上诗》、《下流》、《评仁道》、《批评杂谈》、《中国歌舞短论》、《黑天使答黎锦晖》等。这一系列的短文，强烈地抨击了当时音乐界的下流人，引起了“明月社”某些下流人的不满，聂耳也因此离开“明月社”，奔赴北京。

1932年8月11日，聂耳来到北京，由“剧联”介绍，很快和剧联北京分盟取得了联系。剧联党组织很关心他的入党问题，派丁玲和他联系。聂耳在北京参加了左翼的多项革命活动，在群众集会时演奏《国际歌》，参加戏曲演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为剧联机关刊物撰写文章等。同年11月，聂耳又回到上海，在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剧务、场记等工作。

1933年初，聂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生活。1934年，是聂耳一生中音乐创作大丰收的一年。为了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战斗歌声，他自觉地深入到劳动人民群众之中，体验人民生活，倾听人民呼声，收集创作素材。他的《开路先锋》以其排山倒海之势，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力量。

聂耳的革命斗争精神表现在他直接参加各项群众斗争。1933年，他领导“联华”同人会和资本家进行斗争，1934年在“百代唱片公司”和任光一起举办“新声试唱会”，和黄色音乐进行正面斗争。一系列的斗争，使聂耳锻炼成了一位杰出的鼓动家、社会活动家。

1935年，党组织派聂耳赴苏联考察，取道日本，7月17日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逝世，时年仅23岁。

聂耳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音乐财富。他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特有热情，谱写了30余首革命歌曲，改编了5首民乐合奏曲，发表了一系列的音乐评论和战斗短文。他在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正确地继承了民族音乐传统的优秀素质，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丰富了传统，创造了崭新的、民族的革命群众歌曲的音调，形成并奠定了中国革命群众歌曲的风格，并且把这一音乐体裁的发展，在中国音乐史上推到了空前的艺术高度。聂耳创作的歌曲，内容朴实，格调清新，形式多样，但又都富有战斗精神。甜美动听的民歌有《茶山情歌》、《采菱歌》、《塞外村女》等；抒情性加战斗性的歌曲有《春回来了》、《铁蹄下的歌女》等；具有朗诵性音调的歌曲有《梅娘曲》等；风格上比较新颖的歌曲有《告别南洋》等；简洁短小、富有战斗力的歌曲有《开矿歌》、《大路歌》、《打砖歌》、《打长江》等；生动形象，富有生活气息的歌曲有《卖报歌》、《小工人》等；战斗进行曲有《开路先锋》、《前进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可以说《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一生中最成熟、最光辉的作品。

聂耳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他谱写的歌曲，将永远飘荡在祖国的上空。

结识报童，倾听号子，谱写大众之声

青年时期的聂耳，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认清了自己的创作之路。他坚定不移地坚持深入社会，了解人民大众，谱写人民大众之声。

1933年秋，聂耳在上海霞飞路偶遇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小姑娘叫卖报纸的声音即悦耳又动听，简直胜过一首童声独唱歌曲。聂耳被小姑娘的叫卖声吸引住了，他站在马路边听了很久。后来聂耳约周伯勋一块去霞飞路，专门结识这位卖报的小姑娘。他们两人先把这位小姑娘所卖的各种报纸都买了一份，而后亲切地询问这位小姑娘家住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都干什么工作。从小姑娘嘴里他们了解到：她还有父母亲，父亲患病无工作，卧床不起，母亲在家照顾父亲，全家人就靠她卖报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如遇雨天，卖不了报纸，全家人就会忍饥挨饿。聂耳听着小姑娘的述说，觉得周身的血液顿时加快了循环，心跳得特别厉害，一股强烈的使命感顿时涌上心头，站在面前的报童不正是几亿劳苦大众的典型代表吗？她的叫卖声不正是中国劳苦大众的呼吁吗？作为人民的音乐家不正需要谱写这样的声音吗？聂

耳创作的灵感顿时涌上心头，决定创作一首反映报童悲惨生活的歌曲。聂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词作家安娥，并请她创作歌词。安娥通过观察小姑娘卖报的情景之后，很快写好了歌词，聂耳拿到歌词之后，连夜谱好了曲子，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卖报歌》。

聂耳拿着创作好的《卖报歌》，又找到卖报的小姑娘，非常高兴地唱给她听，并虚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小姑娘听了反映自己卖报的歌曲，如此生动，如此真实，如此悦耳，她高兴地跳起来拍手叫好：“先生写的歌曲太好了。”随后又对聂耳提出了一点改进意见：“如能把‘几个铜板就能买几份报’的话也能唱出来，我卖报时就可唱这个歌了。”聂耳笑着说：“你提的意见太好了。”随即把小姑娘的意见转告了安娥，安娥欣然将歌词改为“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后来，聂耳见到了那位小姑娘，果然，她一面卖报。一面唱着《卖报歌》。不久，聂耳仍然觉得言犹未尽，接着又谱写了《卖报之歌》。《卖报歌》成功地塑造了卖报姑娘的形象，有力地抨击了黑暗的旧社会。

聂耳创作的歌曲，有相当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歌声。这部分歌曲都是聂耳深入生活，捕捉素材，加工提炼而成的。

一个夏天的傍晚，聂耳和郑君里在黄浦江边的码头上乘凉，两人正在闲聊，忽然聂耳摇了摇头：“别说话，你听那是什么声音？”郑君里一听，原来是搬运工人在台阶上搬运货物，集体发出的低沉壮美的吭唷吭唷的劳动号子。这号子，节奏分明，声音壮美，旋律有力；这号子，是中国劳动大军的呐喊；这号子，是中国人民的控诉；这号子，是码头工人的愤怒。聂耳被这有节奏的劳动号子吸引了。他在这吭唷吭唷的旋律中开始了他音乐形象的思维。很快创作出《码头工人之歌》、《开路先锋》、《大路歌》等著名歌曲。

谱革命曲，唱革命歌，同靡靡之音作斗争

30年代的上海，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统治之下，沉渣泛起，乌烟瘴气，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音乐界，到处充满了《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黄色下流的靡靡之音，毒害和麻醉着青年一代。音乐界的反动文痞散布种种谬论，推波助澜，加以鼓吹。

聂耳当时正在“明月歌舞社”担任演奏员。这个歌舞社上演的节目，虽有反封建、求民主的色彩，但多数节目是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内容空虚、色情庸俗的歌舞。对此，聂耳无比愤怒，以“黑天使”的笔名，投文《上海时报》，给以迎头痛击。1932年7月，他连续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评》等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然而聂耳毕竟势单力薄，并无回天之力，于是不久便愤然离开“明月歌舞社”，奔赴北平，参加革命斗争。在党的教育下，他以音乐为武器，积极创作革命歌曲，同靡靡之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聂耳最优秀的歌曲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

1934年4月，聂耳重新回到上海，在百代唱片公司和任光一起举办“新声试唱会”，大唱革命歌曲，鼓舞人民斗志，压倒靡靡之音，在群众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此同时，聂耳还积极组织了“百代国乐队”、“森森音乐社”、“联华声乐团”等革命音乐组织，把革命音乐者组织起来，向反动势力发起冲锋和攻击。

**饱蘸激情，废寝忘食，
谱写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正当田汉和聂耳准备合力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田汉突然被捕，关在上海龙华监狱里。田汉在狱中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将词写在烟盒的背面，让其家属捎出监狱。聂耳接到歌词后，正值忙于出国苏联考察音乐之际。聂耳先到达日本，一到日本，他便饱蘸革命激情，废寝忘食，谱写《义勇军进行曲》。歌曲谱好后立即寄致通电公司，公司立即合成录音，一首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就这样诞生了。

《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也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正气歌，她的庄严的旋律，是无产阶级的脉搏；她的磅礴的声响，是无产阶级的呼声；她的金色的音符，是无产阶级跳动的心。正气歌，将放射出永恒的光，迸发出永恒的热，染红古老的大地，染红辽阔的太空。正气歌，她光明磊落，气壮山河，鼓舞亿万人民去消灭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

（李修平）

艺术家

——王大化

王大化（1919～1946），生于山东潍县。父亲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当过中学教师，曾在山东省旧教育厅当职员。母亲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十分精明干练。哥哥王大彤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共产党员。

王大化小时候随父母到济南在省立第一实验小学上学，毕业后考入私立济南育英中学，1935年秋天，转学到北平李大钊同志创办的艺文中学读书。他在中、小学时代，天真活泼、兴趣广泛，特别是对于艺术，更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很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他到北平艺文中学上学时，正值“一二·九”运动的前夕，艺文中学又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大化和大彤一样，积极地参加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并在运动的实践中，接受了党的教育，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于1936年春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他努力运用漫画和木刻的武器，来反映澎湃高涨的抗日怒潮。

1939年，王大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任成都市中心区委书记。这年秋天，在国民党投降主义日益暴露和反共阴谋日益加紧的情况下，他根据党的指示，离开重庆，于1940年到达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

王大化在短短三、四年的艺术生涯中，创作并演出了十几个秧歌剧、话剧。经他创作并演出的秧歌剧有《拥军花鼓》、《兄妹开荒》、《张丕漠锄奸》、《二流子变英雄》、《赵富贵自新》、《周子山》、《大特务》、《血泪仇》等；话剧有《祖国的土地》、《我们的乡村》等，并参加了著名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不少作品至今仍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执行“讲话”精神，创演《兄妹开荒》

1943年的元旦、春节期间，为了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配合拥军拥政的爱民活动，又结合老百姓春节拜年的习俗，整个鲁艺沸腾了！王大化和李波为了演出，开始了紧张的准备，找材料，商量配乐……经过几天的努力，他们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对陕北秧歌剧进行了改造。王大化勇敢地放下名演员的架子，走上街头、广场，头上梳起十来个辫子，脸上画上两个黑眼圈，手里拿着一面小镢头，与李波一起演出《拥军花鼓》。吕骥在5年以后写的《悼念大化同志》一文里，记下了这个秧歌剧预演时的盛况：“预演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在瓦斯灯下，几百个人的心随着他那浑厚、自然的歌声和朴素的舞态融和在他所表现的那帮解放了的新农民健康的欢乐里……我将永远不能忘记那次演出。”40多年来，《拥军花鼓》的歌声“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英勇的八路军……”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名歌之一了，它将永远被我们的子子孙孙所喜爱、所歌唱。王大化的名字也必将随着这歌声世代地传下去。

从表演艺术的角度来看，《拥军花鼓》是新的农民在表演艺术中开始获得完美的表现。以后王大化的许多作品，都证明了这个事实。《兄妹开荒》、《张丕漠除奸》、《二流子变英雄》、《赵富贵自新》、《周子山》等秧歌

剧，都是这个创作的继续和发展。

《兄妹开荒》是王大化参加编剧并演出的有名的秧歌剧。这出戏，给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及延安的老百姓留下永久的印象；艾克斯在《崭新的时代、崭新文艺》一文中叙述了1943年2月9日延安文艺活动的盛况时说：“鲁艺秧歌队百余人今起连续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处表演。领头工农形象，手持斧头镰刀。新节目有王大化、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陈云同志看后，认为很好。毛主席连连点头。发笑，赞道：‘这还象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再看当时延安的老百姓，他们一面跟着秧歌队跑，一面高声邀约着说：“去看王大化。”他们看了一场又一场，王大化成了延安老百姓中的明星。一时之间，《兄妹开荒》不仅风行于各解放区，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曾得到了广泛地、热烈的赞誉。王大化曾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他演《兄妹开荒》的创作经过。文章写得很实际，也很有水平。他原原本本地介绍了他怎样向人民群众学习，怎样不断地发现自己的缺点，怎样逐步做到外貌到思想感情，从形式到内容一步步地接近角色！从文章里看，他真是经过一番艰苦的艺术劳动。为了歌颂和美化青年农民的形象，他跑到附近农民家里去，仔细观察他们的穿着打扮，去分析他们的审美情趣。最后他找到了他的表现形式，那就是他在以后的演出中，总是喜欢把剧中人物头上的白头巾结子扎在前额上，蓝色的短衫上露出一副白毛衣的袖口，外面披上一件深蓝色的土布短袄，腰间系着一条紫红色细线编织的宽带子，上面的穗穗飘荡着。王大化自己下了苦功，他周围的同志也都为他的表演、歌唱、道白出谋献策，甚至延安的老百姓、民间艺人，都亲自跑到鲁艺帮助出主意。所以当时延安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李伯钊同志在《我所认识的王大化同志》一文中，谈到看《兄妹开荒》时的感受说：“《兄妹开荒》是解放了崭新的农民面相，服饰动作，说不出的自然和谐，那么土色土香的地道的陕北农民的风光，被他们两个演员演活了，大家被他们杰出的演技迷住了。”

1944年夏天，鲁艺的领导决定到南泥湾去劳军。这是王大化极为激动和永远牢记的一次演出。他在千百个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又是杰出的歌手们面前演出了《兄妹开荒》。当他和李波表演到剧中兄妹拿起锄头和挑饭用的扁担，要展开劳动竞赛，唱起“向劳动英雄们看齐”的时候，观众和演员们的心沸腾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已分不开是演员还是观众了，都一致地拿起锄头开起荒地，唱起“向劳动英雄看齐”的歌子。那热情奔放的歌声，响遍了整个南泥湾。

因为王大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在延安的舞台上、广场上，塑造了众多的为延安党、政、军、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所以在1945年1月3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王大化被选为甲等文教英雄。

迎“七大”，执导《自毛女》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党组织号召延安文艺界在秧歌剧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创造出一个我们民族的新歌剧，向“七大”献礼。当这个任务提出以后，鲁艺的文学、戏剧、音乐等各部门都动起来了，加上

刚刚从前方回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大家纷纷寻找题材，最后终于认为西战团的同志们带回来的流传在河北农村的《白毛女》故事，是有典型意义的。周扬首先肯定它，说这个富有浪漫主义特色的民间传说是多么好的主题：“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并且还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来进行动员，要创作出这个剧本。当时还组织了导演小组，有王彬、王大化、舒强，指定大化担任《白毛女》的执行导演，剧本是集体讨论的。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鲁艺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等作曲的著名歌剧《白毛女》。

《白毛女》的创作过程，自然也是充满了困难的。首先这个剧本要反映新旧两个时代，表现出尖锐复杂的斗争场面。而剧中主人公及其他众多的人物都是作者、演员不很熟悉的河北农村的人物，这真是一个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在写剧本的阶段，贺敬之、丁毅、王大化等许多同志，认真推敲、仔细琢磨；在音乐创作上，马可、瞿维、王大化等人又深入研究探讨。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王大化从戏剧部的大石窑研究剧本回家，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他从房间缝里看到马可还在他那小屋里（他们两家住隔壁）写《白毛女》的曲谱，他便一步跑到马可屋里，两个人又谈起《白毛女》中如何运用河北民歌的问题来了。

在《白毛女》的排练阶段，王大化和舒强，又和演员王昆、林白、张守维、吴坚、邸力、赵起扬、陈强、王家乙、李波、韩冰等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反复进行排演工作。

作为执行导演的王大化与《白毛女》剧组的全体创作和演出人员，以极大的创作热情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历时3个多月，终于把《白毛女》新歌剧如期地创作出来，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献礼。毛泽东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观看演出后，作了重要指示：这个戏是非常合时宜的；艺术上是成功的；黄世仁应当枪毙。这部作品是我国第一部深刻反映劳动人民命运和斗争的新歌剧，为后来歌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它的演出，产生强烈的政治效果。

英名永存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以后，延安的一批文艺工作者，随着干部团开赴东北。王大化就在这年的9月2日早晨，离开了他工作、学习、生活近6年的革命圣地——延安，出发到东北开辟新的工作。

到了东北，王大化被任命为戏剧部长，党内当选为组织委员。这副担子对年轻的王大化来说是很重的。可是他凭着对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硬是把这副担子挑了起来。他不管团里团外工作多忙，每天都一定要抽时间和团员同志们谈话，他谈话的方式灵活多样，态度和蔼亲切，所以大家都愿意接近他，有什么心事都愿和他谈。他曾说：“要深入了解每个集体成员，要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理活动——这对我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但这又是能开困难之门的第一把钥匙！”

王大化在东北短短的一年里，在文工团内部，在编剧方面，参加创作了话剧《祖国的土地》、《我们的乡村》，创作秧歌剧《大特务》、参加改编秧歌《血泪仇》；在导演方面，导演过话剧《东北人民大翻身》、秧歌剧《兄妹开荒》、《大特务》、《血泪仇》、话剧《合流》、《把眼光看远点》；

演出方面，他演过《兄妹开荒》中的兄、《大特务》中的大特务、《血泪仇》中的王东方、《把眼光看远点》中的老大、《祖国的土地》中的马占彪、《日出》中的胡四。此外，他还负责全部演出节目中的舞台设计；担任《黄河大合唱》及其他歌曲的独唱和领唱；他还执笔写宣传文章，编辑全书、设计出版物的封面等等。文工团的对外工作也是多方面的：辅导当地的戏剧工作者或旧艺人，引导他们走向新方向，介绍剧本，帮助并组织戏剧、音乐讲座，并担任主讲。

王大化这样日日夜夜为党工作，份内份外争分夺秒地干，是因为在他脑子里装的是：革命斗争、艺术事业、文工团的发展和巩固，他没有丝毫的个人欲望，他所喜爱的东西，也正是工作需要的东西。

正当东北人民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又迎来了 1947 年元旦和春节。王大化于 1946 年 12 月 19 日晚上，在齐齐哈尔市演完了《兄妹开荒》的最后一场，准备第二天一早率领工作组由宁年乘汽车赴讷河搜集春节创作及演出材料。由于战争环境、交通不便。他们乘的汽车是私人拉脚的汽车，车上行李堆得很高，人又很挤，王大化为了照顾别的同志和老乡的安全，自己坐在卡车的后顶上，冒着零下 40 度的严寒，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着。卡车突然震了一下，王大化从车顶上甩了出去，跌在一两丈远冻得象钢板一样坚硬的土地上，当时昏迷不醒。立即送讷河陆军医院抢救，确诊为脑出血、脑震荡。终因伤势过重，无法挽救，于 21 日下午 7 时 50 分与世长辞了！年仅 27 岁。

王大化牺牲以后，《东北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都发了消息，表示沉痛的哀悼。1947 年 1 月 19 日，《东北日报》、《解放日报》同时以整版的篇幅出了《纪念特刊》，凯丰同志以“人民的艺术家”的亲笔题词，代表了党和人民对年青的全才的王大化一生的艺术事业所作出的崇高的评价。

1957 年文艺界的老战友，又在报刊上发表许多纪念文章，表示对大化同志逝世 10 周年的纪念。1986 年 12 月，在王大化的家乡——山东潍坊，由潍坊人民政府和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纪念人民艺术家王大化逝世 40 周年的纪念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陆懋曾等领导同志和潍坊市各界人士 500 人参加了纪念大会。

王大化同志的艺术生命永存！

（巍中、刘兴旺）

铁路工程专家

——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字眷诚，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广东南海（今广州）人。1872年以幼童留学美国，为中国所派的第一批留学生。187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的纽海文中学。后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1891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教于福州船政局，广东博学馆，广东海图水陆师学堂，后被聘为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1905年至1909年，他不顾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奴才们的阻挠和讥讽，以总工程师、总会办的身份毅然主持京张铁路这条艰巨复杂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使京张铁路成为完全由我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辛亥革命后，詹天佑等发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他当选为会长。1919年4月24日，他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时年仅58岁。

詹天佑第一次参加修建的铁路是唐津（唐山—天津）铁路。在铁路的修建中，詹天佑处处表现出了超群的才能。在他主持下，只用80天的时间就指挥完成了塘沽到天津间的铺筑工程。1892年，当工程进展到滦河时，由于河深、水急，美、日、德三国的工程师在给桥打桩时失败了。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次采用“压气沉箱法”，改换桥桩地点，按期完成了滦河铁路大桥的全部工程。

在京张铁路开凿号称“天险”的八达岭隧道工程中，他精心设计出从两端向中间同时开凿和中距离凿进的方法。为了使列车安全地爬上八达岭，他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出一段“人”字形线路。1909年9月24日，京张铁路全线通车，比原计划提前两年，还结存基金白银28万余两。京张铁路全线凿有四座总长1700多米的隧道，架桥125座，建涵洞200多个，动土石约200万立方，工程浩大艰难。当时，有人把京张铁路与万里长城并列为中国伟大的工程，称颂为“祖龙望而夺气”。

1913年，在詹天佑主持下编撰并出版了《京张铁路工程纪要》和中国第一部工程技术词典《华英工程词汇》。他一生念念不忘“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希望工程技术人员“各出所学，各尽所知”；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共同为建设祖国出力，为中国科技人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为祖国学习

詹天佑，这个名字是同中国自修的第一条铁路——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联系在一起的。在他58年的人生旅途上，写下了中国人奋斗之“路”，写下了中国铁路史上的光辉篇章，写出了“中国人的光荣”。

1872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由于家境的贫寒，不得不卷起铺盖到香港投考清政府筹办的“选送幼童出洋预备班”，录取后，他的父亲怀着将与爱子离别的沉痛心情，在写着“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志愿书”上签字画押。从此，他别离故土、父母，作为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强烈愿望，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

“中国也要有自己的火车与轮船”。当詹天佑目睹了美国先进的西方文

明后，一种强烈的愿望油然而生。从此，他发奋图强，更加坚定了为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青春而学习的决心。1878年，詹天佑在美国纽海文学校完成中小学课程后，又考入了美国耶鲁大学，专攻铁路工程一科。在4年的大学学习生活中，詹天佑刻苦攻读，一、二年级获得了数学奖金，在毕业考试时，又荣登榜首，他的毕业论文《码头起重机的研究》被称为很在学术价值的佳作。

在詹天佑即将毕业的那一年，清政府致函美国国务院，准备选一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到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军事，詹天佑就在推荐之列。后来，得到了美国政府“这里没有容纳中国留学生的地方”的轻蔑答复。这时，清政府内部顽固派代表专任留美学生“正监督”的吴子登，对留学生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处处吹毛求疵，极尽破坏之能事，并暗中上奏朝廷，制造种种谎言，造谣诬告，胡说什么这些学生久居美国，必将成为异端，后患无穷。1881年，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听信谗言，命令容闳把前后派送出的120名留学生全部召回国内。在这些留学生当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取得了学士学位。

为祖国战斗

1881年7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詹天佑带着对祖国故土的一往深情，“少小离家老大回”，踏上了思念已久的国土。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铁路专科毕业生，他决心用所学的知识报效国家。然而，那些昏庸腐败的清政府官员对出国的人才不屑一顾，竟然把有铁路工程建设专长的詹天佑派往福州水师学堂学习驾驶，任洋文教习。从此，詹天佑开始了他用非所学的7年“水师”生涯。

1884年5月，法国殖民主义者在用武力胁迫越南沦为它的“保护国”后，又策动了一场新的侵华战。当时，清政府内部，有的主战，有的主和，争论不休。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对外“自始至终委曲求全”，妥协让步。法国侵略者以和谈为烟幕，不到5个月就占领了马尾港，包围了福建水师。在这唇亡齿寒、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胆小如鼠的船政大臣、负责指挥福建水师的何如璋，一心乞盼议和成功。当法国侵略者通知定期开仗时，他竟不令备战。开战时，他恐慌万状，命令水兵不准主动开火，本人则弃甲逃遁，致使中国水师伤亡很大。

詹天佑在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他事先看到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战争势态对福建水师极为不利，私下对管带张成说：“法国的兵船越聚越多，准备伺机卷土重来。我们虽然没接到迎战的命令，但要抓紧备战，我们决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为了防御法军的袭击，“扬武”号事先进行了战备。果然没出詹天佑所料，几天后，法国船队向福建水师发起偷袭。海面上炮声隆隆，弹如飞蝗，海水犹如一锅开水沸腾翻滚。在这惊涛骇浪的战斗中，詹天佑驶着“扬武”号赴汤蹈火，勇往直前，一枚又一枚的炮弹不停地飞向敌舰，在闽江口外与法军舰队鏖战了5个多小时，充分表现了詹天佑和“扬武”号爱国官兵为祖国而战的顽强斗志。

这场英勇的海上搏斗，使在上海的外国商行大为惊讶。英商所办的《字林西报》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船的学生五人中，以詹天佑表现最为动人。他临大敌毫无畏惧，鼓其余勇，浴血奋战……”

为祖国争光

1888年3月的一天，正在福建水师服役的詹天佑接到一位同学的来信，邀请他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从此，詹天佑才有机会开始献身于中国的铁路事业。

上任伊始，詹天佑就表现了超群的筑路才能。在修筑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中，需要在滦河上架一座横跨大铁桥。由于滦河水流急，泥沙深，美、日、德三国工程师在给桥打桩时都失败了。美国工程师喀克期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不得不请出了过去从不放在眼中的中国工程师。詹天佑经过缜密的测量，反复的研究，利用“压气沉箱法”克服河流动层厚的困难，按期完成了滦河大铁桥的全部工程。詹天佑的“压气沉箱法”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的成功，使那些一向自命清高的外国工程师惊奇万分，也使詹天佑和他的同事坚定了此后担负更艰巨任务的信心。

1905年初夏，居庸关外，狂风怒号，满天灰沙。詹天佑和同事们骑着小毛驴，从崎岖的山路上走来。这时45岁的詹天佑已被任命为京张铁路的总办兼总工程师。

京张铁路总长虽然不过200公里，但沿途横跨崇山峻岭，工程极其艰巨。当时，国内外冷嘲热讽四起，“中国人能开凿关沟段（京张铁路最险峻之处）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有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还得等50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

一心一意为中国人民争光的詹天佑，面对洋人的种种非难和恶意中伤，他愤慨地说：“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詹天佑的每一句话，都深深震动着每一个在场的工作人员的心。工程一开始，詹天佑就以全部的身心投入工作，他多方搜求文字资料，亲自访问当地居民，冒着塞外凛冽的寒风和漫天的灰沙，常常骑着毛驴在山径上奔波。白天背着仪器翻山越岭；晚上伏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他先后测量三条线路，几乎走遍了整个京张工程地区。

“轰隆隆！轰隆隆！”炸药的轰鸣声震撼了山谷，响彻云霄，京张铁路到了攻克“关沟段”险阻的关键时刻。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隧道凿进几十米的时刻，山顶的泉水突然渗入洞中，倾刻间，洞中满是泥泞。工程难以继续进行下去了。

要是抽有水机就好了，可是没有。于是，詹天佑带头拿着水桶去排水。本来，不少人感到有些懊丧，见总工程师毫不气馁，也振奋起精神，操起了水桶……

当时，一位叫金达的英籍日本工程师来问詹天佑：“隧道工程为何不包出去呢？”

“包给谁？为什么要包出去？”詹天佑反问道。

“没有通风机和抽水机，怎么能开凿隧道呢！我给您介绍一个日本包商吧，他可以包揽这项工程的一切，而且价格要比其它承包商都便宜。我想，贵国政府是会批准的，总不能让工程半途而废吧……”

“我这里不需要，谢谢你的好意了！”詹天佑立即拒绝了。英国工程师没精打采地走了。

“关沟段”的工程虽然艰难，但是在詹天佑的领导下，不久就按计划完成了。紧接着，比关沟段隧道长3倍的八达岭隧道也动工了……

为了克服陡坡的阻难，保证列车能安全地爬上八达岭，他匠心独运，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的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出一段“人”字形线路。这样，减少了隧道的长度，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备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推一拉，列车就可以顺利地爬上八达岭。这是詹天佑在铁路工程上一个创造性的设计。

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全线铺轨工程完成。9月24日全线通车。这条在外国人看来需要6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的铁路，詹天佑仅用了4年就完成了。工程费用比预算节约了28万两白银。

1909年10月2日8时许，一辆满载着中外来宾的特备专车，从北京西直门外发车北去。车箱内中外佳宾赞声不绝。

“是啊，大出意外！万万想不到詹天佑先生自始至终坚持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而且干得这么漂亮，我不能不佩服他！”

“京张铁路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

“京张铁路可以与万里长城相媲美！”

——声声啧啧称赞，扬了国威，争了国气。请听詹天佑在通车仪式上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吧：“这条铁路终于通车了！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光荣属于中国！”

詹天佑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洒尽了一腔热血。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他的事业，但他所建造的中国第一条铁路仍在，他那一切为了祖国而奋斗不息的精神永存！

（张建一）

地质学家

——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县人。中国地质学家、地质力学创立人。1902年到湖北省城武昌市武昌西路小学堂读书。1904年夏天，尚未毕业，就被决定选派东渡日本，进弘文书院学习日语。1907年7月，李四光离开东京，进了大阪高等学校，学习造船机械。191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回国不久，又被公费送往英国学习。1913年7月，李四光离开祖国，抵达英国后进了伯明翰大学。先在采冶系学习两年，然后转入地质系，专攻地质学。1919年夏，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1920年5月回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等职。

全国解放后，李四光曾任地质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兼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主席。被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之一，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年代，教学、科研条件严重不足，李四光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实地考察，在古生物学、冰川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早在20年代初，李四光就认真调查了北方石炭二叠纪含煤地层，对古生物中的原生门类 and 石炭二叠纪的蜓科化石进行深入研究，赢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在太行山麓、大同盆地等地区先后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有力地推翻了国际上许多冰川学权威断言中国无第四纪冰川的错误结论。

李四光在地质学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地质力学方面。用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的现象，探索地壳运动与矿石分布的规律，把各种构造形迹看成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开拓了地质科学的新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运用地质力学分析我国东部地质构造特点，驳斥“中国贫油”的谬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的相继发现，证明了他的科学预见。在地震地质领域，强调在研究地质构造活动性的基础上，观测地应力变化，为实现地震预报指明了方向。

李四光一生科学论著很多，主要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部之蜓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地震地质》，以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立志科学救国

1904年夏季的一天，一个身材修长的少年长久地站在长江岸边，两眼怒视着这条长江大河上的一艘艘挂着外国旗帜的巨轮，抱在胸前的是两只铁蛋般的拳头。“耻辱，中华的耻辱……”他面对一泻千里的江水，大声地呼喊着。他——就是从小生长在长江之滨的李四光。

1902年，年仅14岁的李四光，背起行装，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去省城武昌的求学之路。一路上，他牢记着父亲临别时对他的嘱咐：“要记住，只有学好本事，才能报效国家。”

也许是机遇，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04年，尚未毕业的李四光，被选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他暗下决心，为中华雪耻，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李四光怀着这种美好的愿望，乘船来到日本。他先在弘文书院学习日语，后又进入了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机械，他是这所学校唯一的一名外国学生，被师生们称为“特别生”。1910年，他这位“特别生”结束了在日本的6年学习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

第二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李四光毅然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被湖北军政府推选为实业部部长。但不久，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李四光的理想未能实现。他又开始寻找去欧洲进修学业的机会和途径。

1912年，当时担任国民党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先生，正在全国选拔去外国留学的人才，李四光又被送往英国学习。

到了英国，李四光和他的好友丁西林同时考取了伯明翰大学。有一次，李四光对丁西林说：“我想由采冶系转地质系，专攻地质学。”

“学地质？”丁西林惊讶地望着他的好友说：“中断了学过的专业，岂不可惜！”

“你想想，要造船，就得有钢铁；要钢铁，就得靠采矿，采矿最终还得靠地质。”李四光极为认真地说。

“对，有你的！”丁西林对自己朋友一席透彻的话深表赞同，夸张地做了一个开锁的手势，说：“所以，你要把开采祖国宝藏的钥匙拿在自己的手里？”李四光郑重地点点头。

1919年夏季，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英国的学习。他婉言拒绝了一位印度友人聘请他去担任待遇优厚的工程师职务的邀请。“回国去……把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祖国，这样更有意义。”他深情地对他的英国老师鲍尔敦教授说。

1920年5月，李四光和同学数人一道，回到阔别数载的祖国，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担任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走上为祖国培养自己的地质学家的教育岗位，也开始了他创造性的地质科学的研究事业。可以说，李四光一生的科学成就，都是在北大期间奠定基础的。

1927年，李四光离开北大。从1927年到1947年这20年间，冬去春来，几经风雨，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李四光没有被国难所吓倒，在教学条件、科研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取得了地质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可喜成就。1947年，由于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受挫，于子三烈士惨死狱中。李四光十分沉痛，一气之下，于同年冬天，和夫人许淑彬一道再到英国伦敦居住。

挡不住的旅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居住在英国南部的海滨小城博恩默斯的李四光听到这一喜讯，格外激动，“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站在楼房的阳台上，望着喷薄欲出的红日，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他想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的过去，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安定下来了，祖国要建设，要富强，多么需要地质学家和其它科学家啊！只有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才能真正破除迷信，打破那些所谓的地质权威下的“中国贫油”的结论，一定要回去，为祖国找石油、找煤矿。为国家效力的时刻到了。

李四光想到这里，转身回到房里，告诉妻子许淑彬说：“收拾东西，我

们回家去！”

李四光要回中国的消息很快被英国的朋友和同事听到了。有的许以高薪、先进的实验室及舒适的工作环境，极力挽留；有的劝道：“凭你的学识和地位，在英国工作几年，很快就会成为富翁。回到落后的中国，简直令人不可思议。”面对这一切，李四光报以淡淡一笑：“也许你们永远不能理解我这颗爱国之心，我既然决定，就义无反顾。”

这时，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的人也出面干涉了。“请李先生能公开发表一个声明，那……政府会给很大好处的。”说着，从公文包里换出一张 5000 美金的支票。

“我们不需要，你拿回去！”

来人颤抖着手，收起了支票。临走时，扔下了一份从台湾拍来的电报抄件。

为安全起见，李四光只身先走，和妻子、女儿约定在法国边境城市巴塞尔会合。第三天，他们一刻也没有停留，立即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货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中南海的春风

1950 年 5 月 6 日，李四光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住在六国饭店。第二天下午 4 点，周总理亲自来看望他们全家。

回到了祖国，李四光的心情几天都没有平静下来。夜里，他辗转卧榻，不能入睡，在脑海里盘算着：“先把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起来……把专业人员集中起来，把队伍整顿一下……找矿、找油……”

1952 年 9 月，地质部正式成立，李四光任部长，一场大规模的找矿工作在全国展开。1954 年 2 月，李四光根据多年的研究和考察，编写了《地质力学概论》，他运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揭示了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指出：“‘海相’可以生油；‘陆相’也可以生油。”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峡，这是一条沉降带。东北的松辽平原又是一条沉降带。这些沉降带，在古地质史上，都曾经具有良好的低等生物繁殖的条件，由于它们不断沉降，周围隆起的地区就会不断提供泥沙把它的表面淹没覆盖，封闭得很好。因而具有良好的生油条件。后来若干个进行勘探摸底的油区，经过区域普查和开发勘探，一个一个地得到了证实。

1964 年底的一天，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李四光说：“总理办公室通知，请你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去一下。”

当李四光一步跨进北京厅时，发现毛主席在那里。李四光认为走错了门，赶忙对主席说：“主席，对不起。”正转身欲走，毛主席走过来，握住李四光的手说：“你没有走错，我就是找你。老李，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心想，我刚学太极拳，主席怎么知道的呢？于是回答说：“我的身体不好，刚学，还打不好。”主席笑开了。原来主席指的是根据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引，在沉降带中找到了一系列的油田。主席让李四光坐下来，把茶几上的茶杯推到李四光面前，亲切地和他谈起我国的石油问题……

献身于地震事业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7级以上地震，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就在这天晚上，李四光参加了周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在回答周总理提出的“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能不能预报地震”的问题时，李四光力排众议，满怀信心地说：“我认为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可以认识的，也是可以预报的。”听了李四光的回答，周总理兴奋地扬起了两道浓眉，赞扬说：“很好，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志气。我们要破除地震‘不可知论’。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我们的前人曾给我们留下地震的记载，我们就要给我们的后人留下预报地震的记录。”

周总理的一席话，使李四光很受鼓舞。从这以后，李四光深感迅速解决地震预报问题的迫切性，他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用到地震预报问题的研究上。

李四光认为：地震是由于地球自转，地下岩层的一定部位受到了一股地应力的作用的原因。地应力不断积累、加强，达到岩层承受不了的地步，岩层就会断裂，结果产生了地震。

因此，他主张用地应力测量的方法，监视活动构造带的地应力活动情况，再加上其它手段，如地下水的观测，地形变化观测等等，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1969年冬季的一天，李四光带领几名科技人员，冒着严寒来到房山县地应力观测站。原来，他为了打消一些人的怀疑，要亲自进行一次“地应力解除”的实验，如果实验成功，那就可以从反面证明地壳确实存在着“地应力”。

钻机隆隆地响了，大口径的钻头向大地深层钻去。李四光用力攥住冰凉的加力铁把，清楚地感受着加力的大小。随着钻头的钻进，看仪表的同志大声地向他报告各项参数的变化。李四光屏住呼吸，留神听着，脸上不时浮现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停！”

他发出了信号，机器停住了。实验证明，“地应力”存在。

实验成功了！所有参加实验的同志都奔到了他的面前，向他彭掌祝贺。

不久，对“地应力方法”的考验来到了。

1967年冬季的一个晚上，周总理接到了有关部门的报告，说这天7时，北京将发生7级地震，要求国务院准许立即通知北京居民到室外避震。总理用紧急电话把李四光叫到办公室，征求李四光的意见。李四光根据对“地应力方法”的实验，结合北京周围预报的情况，从容地说：“……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我的意见是，这个预报还是不要忙着发。”周总理采纳了李四光的意见，避免了数千万人的惊慌骚乱和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971年4月，在病中的李四光对同事们说：“如果还能给我半年的时间，地震预报问题的解决，是大有希望的。”可惜，正当李四光要攻克地质科学的又一堡垒时，不幸身患绝症，于1971年4月29日动脉瘤破裂，溘然长逝。一颗耀眼的智慧之星殒落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而他为祖国地质学所开创的事业，将永载史册。

（张建一）

气象、地理学家

——竺可桢

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出生于浙江绍兴县东关镇一个小商人家庭。在家乡读完小学后，15岁入上海澄衷学堂学习，1909年毕业于唐山路矿学堂（后为唐山铁道学院）土木工程系。1910年赴美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学农，后入哈佛大学学习气象，1918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任地理学、气象学教授。1920年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东南大学）任地理系主任。192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7年筹建南京气象研究所，1928年任该所所长。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2月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奠基人，对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台风、季风、中国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气候变迁、自然区划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竺可桢一生发表了300多篇科学论文，有些论文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倍受推崇。1980年科学出版社精选了竺可桢生前的79篇论文，出版了《竺可桢文集》。此外，竺可桢还非常重视科学普及工作，发表了许多涉及天文学史、地理学史、气象学史等自然科学史方面的文章，留下的气象记录资料800多万字。

学农业，解民于倒悬

1906年，竺可桢在上海澄衷学堂毕业后，又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在这所学校里，他学的是土木工程，打算学成以后，当一名出色的建筑工程学家。一天晚饭后，他怀着愉快的心情漫步在唐山街头，因为那天的考试他又是名列前茅。他正踌躇满志，憧憬着一个建筑工程学家的美好未来。这时，一群衣衫槛楼，瘦骨嶙峋的乞丐围住了他这个戴眼镜穿长袍，看上去很面善的“阔少”。

“先生，给一口吃的吧，救救我们吧！”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把他那芦柴棒一般的手伸向了竺可桢。

一位面黄肌瘦的大嫂，一手抱着干棒似的孩子，一只手向他高举着，挤在人群中气无力地哭诉道：“少爷，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已经一天多没吃到东西啦！”

乞丐的央求声，把竺可桢的愉快心情一下子冲到了九霄云外，他把身上带的零花钱全分给了他们。乞丐们千恩万谢地散去了，竺可桢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中……

竺可桢家是做米粮生意的，他深深懂得粮食给他的父母，给他们这个家庭带来的福祸。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生意还算兴隆；每当灾荒年月，连他们家几乎都揭不开锅，哪里还有粮食去卖？中国地大物博，土地肥沃。可为什么乞丐贫儿踟躅街头？为什么外国人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横冲直撞？民族危

难的严酷现实，深深地刺痛了竺可桢的心。他想，我们的国民连肚子都填不饱，还奢望什么高级住宅？那么我现在学的专业又怎么能解民于倒悬，怎么能拯救中华？

一群乞丐改变了竺可桢的志向。

1910年7月，清政府招考留美学生，竺可桢听到消息后，立即报名应试。由于他成绩优秀，当然是如愿以偿了。不过，他并不是学的土木工程，而是改学了农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民要富裕离不开农业，国家要繁荣，首先应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

竺可桢来到美国后，在伊利诺大学专攻农业。通过几年的学习，竺可桢了解到气象学与农业密切相关，没有气象预报为农业生产作后盾，人们就不可能战胜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农业即使是丰产了也不一定丰收。于是，大学毕业后他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气象学博士学位。这期间大洋彼岸接连传来不幸的消息：父亲病故；大哥病逝；官费留学期满，继续留美只能自费。身处异境他乡的竺可桢，按常理该回国了，可是他却把悲伤深深地埋在了心底，用刻苦学习来作为对亲人的悼念。政府不提供资金，靠家人微薄的资助，把生活费用压到最低水平。经过8个春秋寒暑，2800多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努力，终于在他28岁的时候，拿到了美国一流大学的博士文凭。

1918年秋，竺可桢怀揣着博士学位证书，抱着“科学救国”的幻想，踏上了归国的旅程。然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座气象台是中国人自己掌管的；全国4亿多人口，气象工作人员屈指可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哪里有他的用武之地？

针对这种局面，竺可桢只有到高等学校教书。他一边教书培养气象人才，一边为中国的气象事业而奔走呼号。他怀着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终于于1921年在东南大学（南京）创设了中国第一个气象测候所。1928年，蔡元培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随即聘请竺可桢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多年的夙愿实现了，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气象研究所！竺可桢高兴啊！他以全副的精力倾注于中国气象事业上，就在他任所长的同年，竺可桢怀着为国雪耻的决心，在南京建起了北极阁气象台。以后又在全国各地建立气象台和测候所，并将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测候所，逐步纳入到了中国气象工作的权力范围内。

尽管如此，当时中国的气象研究工作仍不受外国人看重。在国际气象科学会议上，无理规定中国只能派代表列席，不许宣读或发表论文。有一次，竺可桢带队参加在香港召开的远东各国气象会议，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先后两次举行宴会，招待各国代表，都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席。竺可桢忍无可忍，和其他代表一起，愤怒地提出抗议：“这难道就是中国人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吗？不！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有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和浩然的民族正气，怎能容得你们的这种待遇？我们拒绝出席以后的会议！”说完，当场退出会场。

此后，竺可桢更加拼命工作了。终于以他雄厚的研究实力，一篇篇扎实的科学论文，使外国人对中国的气象事业刮目相看了。

坚持真理，刚正不阿

1936年4月，浙江大学的学生轰走了压制爱国学生运动的校长郭任远，

迎来了新任校长竺可桢，25日，师生们隆重集会，欢迎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竺可桢慷慨陈词，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雪国耻的故事，激励学生的学习，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所至。现在的世界是技术的世界，科学的世界。今后应精研科学，充实国力！”

恳切的言词，火一般的爱国热情，赢得了师生们雷鸣般的掌声。

从这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竺可桢一直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善良愿望主持浙江大学。然而，他那善良的愿望却被黑暗的现实打破了。

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失踪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浙江大学。正在病中的竺可桢听到消息后。愤怒至极，从病床上爬起来立即四处奔走，打探消息。于子三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是竺可桢非常敬重的爱国学生，因为他积极带领学生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国民党特务对他早就怀恨在心、蓄谋加害了。这一点竺可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一听到消息他就带着病体，找到了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等地方。

10月29日，四处奔波的竺可桢正苦于没有于子三的消息时，浙江省国民党突然派员给竺可桢送来了公文：于子三在狱中用玻璃片“畏罪自杀”，并要他立即到现场查看证明。

竺可桢跟随来人，赶到了一间阴森可怖的囚室。只见于子三倒在一片血泊之中，尽管身边丢着沾满血迹的玻璃片，但伤口却是不流血的，而身上的棒伤却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更为明显的是，喉咙正中有一个小孔。看着他心爱的学生的尸骨，竺可桢悲愤万分，本来就病弱的身体，这时再也支持不住了，眼前一阵发黑，几乎晕倒在地。随行的校医急忙扶住他，为他打了针，才慢慢恢复过来。

竺可桢立即找到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当面质问：“于子三是怎么死的？你们要解释清楚！”

沈鸿烈非常恐慌，无言以对。一旁的检查官急忙解释道：“竺校长，现在你也看过了，事情很清楚，于子三是用玻璃片自杀的，请你签个字吧。”

竺可桢立即拒绝道：“我只看到于子三已死，决不能证明他是自杀的！”说罢，愤然离去。

于子三的死不仅在学校引起了轰动，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政府为了推卸罪责，利用《东南日报》公开大肆造谣。竺可桢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于11月5日赶到南京。在南京《大公报》、《申报》的记者围上了他，有记者问：“竺校长，于子三在学校时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于子三是个好学生！”竺可桢毫不含糊地回答。

又有记者问：“你对于子三自杀的结论有什么看法？”

竺可桢悲愤地说：“于子三之死是千古奇冤，他的死当局有不可托诿的责任，应立即追查事实真相，惩办凶手！”

竺可桢的谈话很快以显著的位置见报。蒋介石看到后大为恼火，立即授意教育部长朱家骅，责令竺可桢公开更正谈话。竺可桢斩钉截铁地回答：“报载是实，不可更正！”

金蝉脱壳，迎接曙光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

势冲破了国民党的最后一道防线。两日后，民国政府的旗杆上，升起了鲜艳的红旗，南京国民党政府即宣告灭亡。

解放战争的硝烟离上海越来越近了，隆隆地炮声打破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有的紧张，有的快活。

5月2日，上海《新闻报》以显要位置大号标题登载了一条消息：“竺可桢飞台湾”。这则新闻无疑又使动荡的上海增添了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竺可桢可是位受人尊敬，在社会上很在影响的科学家。各界人士猜测、关注、议论纷纷，选择着自己的去留。

而这则新闻影响更大的还是浙江大学。有的欲“跟随”去台湾，有的感到遗憾，也有的表示怀疑。于是有人到竺可桢家探听消息，结果是：竺校长已经好几天不在家了。

学校财务科传出消息说：几天前竺校长在财务科借了一笔款，从此未再见到他。

学校收发室有人说：4月28日国民党教育部给竺校长来过两封电报，催他马上“离杭返沪”。

不错，这些消息都是千真万确的。难道竺可桢真的到台湾去了？人们议论纷纷，疑团倍增。

这时，只有他的妻子陈汲心里最清楚：竺先生决不会去台湾！28日凌晨，竺可桢接连收到教育部的两封电报，都是催他“离杭返沪”，他复电说：“暂难离杭”。当他在财务科借回钱后，对妻子陈汲说：“我暂时到上海避一避，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放心，我决不去台湾。”他还跟妻子谈道：经过我多年观察，国民党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我从留美起就有交往的杨杏佛，不就是死在他们的枪口下吗？还有我的学生于子三……我真正的事业在大陆。

“那你为什么还回那样的电文？”妻子不解地问。

“哈哈，金蝉脱壳之计，这样我住在上海不就更安全了吗？”

为了不引人注目，离家时他没有坐汽车，只叫来了一辆三轮车，冒着瓢泼大雨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到达上海后，竺可桢避住在岳阳路一家医院里，当看到5月2日的报纸后，他很是高兴，这正好为他隐蔽创造了条件。于是他就利用这个机会秘密走访，试图多拉住一些不明真象而又有可能被裹挟到台湾去的科学家。

5月6日，竺可桢正放心地在大街上走着，迎面开来一辆轿车在他面前突然停住了。从车里钻出来一个人，惊奇地说：“竺校长，你不是已经飞台湾了吗？怎么……”

这人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竺可桢急中生智，急忙说：“走，我正在买些东西。”

“快走吧！”蒋经国急躁地说。看着竺可桢点了点头，才放心地钻进汽车走了。

为了避免再被人发现，竺可桢再也没到街上去过。直到5月27日，竺可桢才迎着曙光，来到上海市中心，加入到“欢迎解放军”、“欢迎上海解放”的人流中。

（周永祥）

农学家

——金善宝

著名农学家金善宝（1895~）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一个农民家庭里。13岁时父亲便病逝了，母亲靠养蚕供他上学读书。192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农科，后在浙江大学农艺系任教。1930年留学美国，先就读于康乃尔大学研究院，后转入明尼苏达研究院学习。1933年获硕士学位后即回到了祖国，先后任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无锡江南大学教授。

全国解放后，金善宝历任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南京农学院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林科学院院长等职务。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荣誉委员，中国农学院副理事长。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历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农学家，金善宝不仅在国内闻名，在国际上也是著名学者之一。他长期从事农作物优良品种选育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我国用现代科学方法培养小麦良种的开创者之一。早在解放前，他就从世界各地取得的3000多份小麦材料中选出两个适合我国生长的优良品种，定名为“矮粒多”和“南大2429”。解放后，“南大2429”在长江流域13个省、市和地区大面积推广和种植，获得高产。后来又培育成多种春小麦品种，在早熟性、抗病性、丰产性和籽粒品质等方面都赶上或超过了墨西哥小麦。他领导农业科技人员从全国各地征集到5544个小麦品种，经研究鉴定，分成普通小麦、元锥小麦、硬粒小麦和“云南小麦”5类。通过对小麦及其分布的系统研究，为我国小麦育种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善宝撰写的科学著作很多，主要有《中国小麦分类》、《实用小麦论》、《中国小麦区域》、《中国小麦栽培学》、《中国小麦品种志》以及《马铃薯栽培法》等。

浩然正气，展现民族气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世界上许多帝国主义列强都向我国伸出过侵略的魔爪，致使本来就不富足的中国，更加贫穷落后了。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的金善宝，尽管当时还不明白这些道理，可他却看到了在这片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土地上，人民吃不饱、穿不暖，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怎么能行？金善宝决心要学习农业，发展农业，解除人民的疾苦。

金善宝中学毕业了，正当他愁于愿望不能实现，投师无门之际，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南京办了个高等师范，并设有农业专修科。于是，他喜出望外，不辞劳苦徒步到南京参加考试。结果以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了。

3年学习期满后，金善宝以优异的成绩被留在学校农场当了技术员。1921年，南京高师改为东南大学，农业专修科也改为农科，学制由3年改为4年。金善宝又于1926年回校补学了一年，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

“学无止境”这个词用来形容金善宝强烈的求知欲望是再恰当不过了。

1930年，35岁的金善宝已经出版了《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和《实用小

麦论》两部学术专著，成了国内较有名气的农业专家。然而，金善宝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先后在两所大学研究农作物的育种。

有一次，康乃尔大学的外国学生举行聚餐会，金善宝等中国留学生跟他们同室两桌吃饭，一边是美酒佳肴，一边是简单地饭食。席间对面桌上不时传来有辱中国的言词，投来鄙视的目光，出于礼貌，中国留学生们强压怒火，一忍再忍没有发作。当外国人酒足饭饱之后，餐桌杯盘狼藉，一个外国人指着那些残汤剩饭说：“把这些都拿去给中国人吃吧！”

这时，金善宝再也忍不下去了，他愤然而起，两眼怒视着那个外国人反驳道：“你们金元帝国，街头不是到处都有失业的流浪者吗？”

“哟，你这个中国穷鬼，能吃到我们的剩饭就不错了！”那个外国人傲慢至极地说。

“我们中国尽管暂时还很穷，但是中华民族是不容别人随便侮辱的！”金善宝紧握双拳，向前逼近一步，声色俱厉，其他留学生也个个怒目正视。

金善宝的浩然正气，吓得那个外国人胆战心惊，没敢再吭声便溜走了。

根据金善宝强烈的求知欲和研究实力，应该继续留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可在美国短短的3年中，他经常受到类似的歧视和侮辱。他再也无法呆下去了，于是便放弃学业回到了祖国。他多么盼望自己的国家早日强盛起来啊！

自强不息，烧掉民族屈辱

1933年，金善宝抱着“科学救国”，使祖国早日强盛的美好愿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任教授。

这一年，阴雨连绵，江水暴涨，长江一带一片汪洋，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未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南京的农业科学机构从美国的棉麦借款里分得了一部分以“慈善援助”为名的麦种。在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任教授的金善宝，满怀喜悦的心情，把它播到试验田里，他像照顾婴儿一样，辛勤地除草、施肥、浇水。他多么渴望这些麦子能够高产，作为种子尽快送到灾区农民手中，使他们度过灾荒年。他几乎每天都要到试验田里去一趟，看着他们分蘖、拔节、扬花……

6月初，小麦成熟了。金善宝满怀喜悦的心情，和农场工人一起，顶着烈日开镰收割，打麦扬场。

可是，万万没想到，100多亩麦田里产下的麦子全部患有黑穗病！这些麦子不要说用来作麦种，连吃都不行，而且还会带来扩大病源的危险。

什么“慈善援助”，分明是对中国人的耍弄、坑骗和欺辱。

有人提议，跟美国人评理去！

“评理？跟他们有什么理好评！”金善宝愤怒至极，“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歧视、受坑骗、受凌辱的事例还少吗？”于是，他把这100多亩地里的麦子全部集中起来，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烧吧，烧吧！烧掉的不仅仅是100多亩病麦，同时也烧掉了中国人民的屈辱！

这件事对金善宝的刺激很大，他清楚地认识到，要使祖国富强起来，一味地等靠别人是不行的，要自己动手，培育我国小麦的优良品种。他不顾生

活的艰难，不顾条件的恶劣，不顾反动政府的百般阻挠，风餐露宿，凭着他对祖国、对人民的一颗爱心，凭着他不屈不挠的毅力，走遍了祖国各地，几年内搜集到全国 790 多个县的小麦品种，从中鉴定出了“江东门”、“南京赤壳”、“武进无生”等优良品种。

解放战争后期，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节节败退。这时蒋介石一方面负隅顽抗，一方面拼命在大陆掠夺财富，也包括对人才的“掠夺”。

一天，金善宝突然接到了台中农学院寄来的聘书，“邀请”他到台湾任教。金善宝拿着聘书，往事象电影一样，历历在目……

1939 年夏，为使抗日战争早日胜利，金善宝想在农业科学方面贡献力量，争取多打粮食，支援抗日。于是，他和蔡旭一起到农村考察，不想却以“煽动饥民造反罪”被扣压……

1945 年 8 月，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局势那么紧张，工作那么忙，还抽出时间会见金善宝。毛主席那和善的面容，亲切的言语……

多么鲜明的对比！

再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土地在大陆，我怎么能到台湾去？金善宝拒绝了“邀请”，毅然留在了大陆。

全国解放后，金善宝以极大的热情，百倍的努力，走平原，爬山岭，从全国征集到 5544 个小麦品种，从中鉴定出 5 个品种，126 个变种，并培育出了多种春小麦，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5 年，在金善宝 60 寿辰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金善宝说：“我要把 60 岁作为新生命的开始，把一切献给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金善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他 80 多岁高龄时，依然走南闯北，为我国农业发展发挥着他的光和热。

（周永祥）

医学家

——林巧稚

林巧稚（1901~1983），出生于福建厦门市的鼓浪屿。祖父是种田的农民，父亲林良英是教师。林巧稚5岁的时候，母亲因患宫颈癌不幸病故。1920年夏天，林巧稚高中毕业后，为了死去的母亲，她决心学医。1921年9月林巧稚考入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29年林巧稚在协和医学院毕业并获博士学位，同年被协和医院聘请为第一名女住院医师。1932年，林巧稚园工作卓著荣获协和奖学金，踏上赴英学习深造之路。1935年7月晋升为讲师、主治医师。1937年11月晋升为副教授。1939年9月林巧稚到芝加哥大学进修，因成绩优异被吸收为芝加哥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1940年冬，林巧稚回国。1941年10月，林巧稚被任命为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这是协和医院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科主任。

全国解放后，林巧稚被选为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被评为全院的先进工作者，同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60年被评为全国群英会代表。1983年4月22日，这位中国医学界的泰斗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林巧稚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疑难病症的诊断与处理。对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生殖道结核，滋养细胞肿瘤发生、发展规律，绒毛膜上皮癌进行过研究，在滋养细胞肿瘤化疗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受到国家的奖励。

林巧稚除发表多篇论文外，主编过《妇科学进展》、《妇科肿瘤病学》等专著和《家庭顾问》、《农村卫生常识回答》等科普读物。

为民学医

林巧稚5岁那年，正当壮年的母亲患宫颈癌不幸病故。她小小年纪，就过早地失去了慈母之爱。

那是一个凄苦的夜晚，病危的母亲被抬到客厅的一张单人床上，她痛苦地躺在那里，已经不会说话，多年疾病的折磨，使她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一去，她急促地喘着气，微睁着迷蒙的双眼，在这离别人间的时刻，最使她牵肠挂肚的就是小女儿巧稚，她太小，正需要母亲的抚养。撇下她，这孩子孤苦伶仃的，今后将如何走完一生漫长的道路？母亲眼角垂泪，双眉紧锁，欲言无声。

大儿子林振明连忙凑到母亲身边，柔声问道：“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母亲只是轻轻地翕动了几下干瘪的嘴唇。她看了振明一眼，失神的目光缓缓地转向巧稚，久久地停在她身上。

振明懂得母亲的心思，用力地点了点头，凑到母亲耳边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妹妹！”母亲的嘴角掠过一生中最后的一丝微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妈妈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这在小巧稚心中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后来她终

于从大姐和嫂子的口中得知，母亲的病症是子宫大出血；再后来，知道那里出血的原因，是子宫长了瘤，用新医学的名词来讲，就是宫颈癌。据说，母亲在怀她的时候，此病已逐渐形成。所以影响了她的发育，她的身材比大哥、大姐矮得多。

母亲的早逝，使巧稚从幼年就知道了女人病痛，懂得了妇女的健康对后代的影响。当她在夜里为自己过早地失去妈妈而暗暗流泪的时候，她想：我为什么不是医生啊？我要是个手到病除的神医，一定会把妈妈挽留在这世上……从这时起林巧稚心中就萌动着这样的心愿，为了告慰妈妈的在天之灵，为了拯救像妈妈一样的病人，我要学医……

1921年夏天，恰巧协和医学院招生，可是全国只招30人左右，林巧稚和同学琼英结伴到了上海，进入了协和医学院上海考场。林巧稚坐在教室后半部的一个位置上，心里突突直跳，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啊！当时正值酷暑，天气闷热，连一丝风也没有，空气好象在燃烧，考生们个个汗流浹背，林巧稚顾不得这些，脑子不停地想，手不停地写，汗珠从额角上淌下来，也顾不上擦一擦。

“林巧稚！”突然，监考的美国教师在门口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喊了一声。

林巧稚一惊，到点了吗？她以为教师在催自己交卷，顺口用英语答到：“我还没答完！”说罢，头也不抬地继续写着。

想必是她英语说得很熟练，美国教师改用英语说：“密斯林，请你出来一下。”

林巧稚这才放下笔，把卷子扣在桌面上，急忙走出来。

美国教师急匆匆地把她领到一个房间，原来她同来的琼英中暑了。只见她两眼紧闭，口吐白沫……林巧稚迅速和另一个女同学一起，把琼英抬到阴凉的地方，解开她旗袍的领扣，又在她额上放了一条凉毛巾，然后，马上给琼英在上海的姐姐挂了一个电话……

这一切，只用十几分钟，处理得那样敏捷、迅速。

一切事毕，林巧稚才回到自己考场。可是刚坐下不久，时间到了。她望着还有几道未做的试题，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只得把卷子交给了主考老师……

在录取时校方认为：第一，林巧稚总分不低；第二，她英语好，特别是口语流利；第三，她考场发生的突然事件中，处理问题紧张而有秩序，具备一个医生应有的素质。

她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金榜题名的荣誉。

“把病人当成亲姐妹！”

8年寒窗，多少个日日夜夜，在这长距离赛跑中，有人退缩，有人落伍，有人败阵！入学时全班25名同学，到1929年6月毕业时，仅剩下了16人，淘汰率将近百分之五十！这是多么激烈的一场竞争啊！而林巧稚却以优异的成绩，一路领先，独占鳌头，赢得了学校授予的文海奖学金，并分配到协和医院做了妇产科的住院医师。

当时的“协和”对中国医护人员非常歧视，对中国病员十分冷漠。林巧稚处境相当艰难，但她对病人关怀备至，表现了一个中国医生应有的志气和

品格。

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道济医院——一个比协和条件差得多的医院——妇产科来了电话，请外国大夫马士敦会诊。马士敦嫌冷，冷漠地说：“天明再说！”

“不行啊！”林巧稚急切地说：“病人等不到天明啊！”

“那就算了！”洋大夫冷冰冰地挂上了电话听筒。

林巧稚对自己的同胞却放心不下，冒着刺骨的寒风，跑到道济医院，经过会诊，认为必须给病人切除子宫，要动手术。在非常简陋和困难的条件下，她顺利完成了手术，病人得救了。

1937年1月26日，靠修理自行车糊口的工人周振修的妻子吴淑明，怀孕6个月，腹内长了一个奇怪的肿瘤，躺不下，睡不着，吃不进，腹内的肿瘤越来越大，胀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全家和邻居都说“没指望了”。周振修的母亲一边哭一边赶制装殓的衣裳……周振修想：“上协和，豁出去了，死马当活马医！”1月30日下午，吴淑明被送进了协和医院。

苍茫时分，周振修心神不安地坐在协和医院妇产科的走廊里，妻子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他还没有吃饭，身上穿着沾满油渍的破棉衣，显得更加单薄。不知是由于冻饿，还是由于妻子疾病的担心，他的身子有些发抖。

手术室的门开了，林巧稚步履轻捷地走过来。周振修迎上去，急切地问：“大夫，我家里的，有，有救吗？”

“别着急，”林巧稚全不在乎他满身油污，拉着她的手，让他坐在长条椅上，然后，亲切地问道，“病人是你的太太吗？”“啊，是啊！”周振修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接着，林巧稚又详细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周振修把凄惨、困难的家境如实地告诉了大夫。

“你放心！我们尽力抢救！”林巧稚说完，急忙走进手术室。

一会儿，一个小护士给周振修拿来一包饼干，端来一杯开水，说道：“这是林大夫让给你送来的，她让你等开完刀再走。”

“刚才那位大夫姓什么？”周振修没有听清护士的话，又问了一句。

护士提高了声音：“姓林，林——巧——稚。”

“林大夫……”周振修一手拿着饼干，一手端着开水，感激的泪水挂在脸上，心想：妻子能遇见这么一位好大夫，可真是福份！

周振修接妻子出院之前，全家最担心的，是交不起手术费，可是算帐，住院处却告诉他：住院费、手术费、饭费，一概免收。原来是林巧稚知道他们家困苦的情况后多次向医院社会福利部反映，在她的要求下，医院同意给予救济。

林巧稚经常告诫实习的学生：“一个医生首先要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产妇或者病人进了医院，就把他们的整个生命交给了我们。我们要把他们当成亲姐妹。从每件细微的小事做起，体贴和关怀她们。比方说。一个产妇在分娩的时候，痛得难忍，她要寻找帮助，她要抓一件东西。你让她抓什么呢？让她抓铁床架吗？那她的手关节就在受凉，就要得病。我说，这时候，你应当把你的手伸过去……”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林巧稚正是这样做的，她常常把手伸给呻吟的产妇，让她们抓住，减轻她们的苦痛。

“我和我的事业将与祖国共存”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了，东北的一些地主豪绅，纷纷逃到北平。协和医院的门诊厅里，每天都传播着这些人从关外带来的耸人听闻的消息。

北平骚乱起来，那些早有心计的上层人士，纷纷收拾细软珍宝，夺路南逃了。

这时，同事、患者、朋友，有不少人都劝她走。

“凭您的资历、医术，到哪儿不行？去英国、美国也吃得开！”

“有的大夫已经走了，您也快走吧！”

“您全家在厦门，何必自己留在北平呢？要走，可得趁早！”

林巧稚摇摇头说：“我个人走是容易的事，可是科里这一大堆病人谁管？医生、护士谁管？我是科主任，能丢下大家一走了之吗？”

几天后，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夫人送来一张飞机票说：“林大夫，您治好过我的病，我一直感激您，可也没有什么好报答的，眼下北京的时局您知道，恐怕是保不住了，我这里还有一张机票，您快走吧！这可是用金条也买不到的啊！”

“谢谢，谢谢您，太太。”林巧稚为朋友的情义所感动，一再道谢，但她主意已定，果断地说：“我决定不走了，哪儿也不去，留在北平。”这时林巧稚擦了擦双眼，深情地望着窗外，庄重地说：“我和我的事业将与祖国共存！”

林巧稚留下来了。她在病房里迎来了北平的解放，从此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

新中国成立后，林巧稚在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逐步认识了新社会，从一名治病救人的“良医”，变成一位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民医生。她为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日日夜夜勤奋工作。她还深入农村、城镇考察，为新中国保护妇女、儿童的立法提供了科学依据，成为周总理研究妇女、儿童健康问题的参谋。建国初期她专门买了一个精致的镜框，将开国大典的画片镶了进去，挂到屋里，并且激动地说：“我受到了阳光的沐浴，呼吸到了新鲜空气，赢得了一个科学家真正的权利和自由！”

“我就是离不开病人”

美国的医师约翰·期·鲍尔士曾经这样评价林巧稚：“现在的中国，她被看做一个医生女英雄……除了她出众的临床才华之外，……她很能理解人，她同患者有一种特殊亲密的关系。”

鲍尔士的分析和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林巧稚对任何病人都有“特殊亲密”的感情，她的事业始终与病人联系在一起，病人就是她的亲人，她常说：“我就是离不开病人，一天不见病人就心烦意乱。”

她的奋斗目标就是：“让所有的母亲都高兴平安，让所有的孩子都聪明健康。”

正是她这“特殊亲密”的感情，使她赢得了患者的信任，人们崇敬她，把她看成自己的知音、自己的救星、自己心目中的“女英雄”。在她办公桌上，每天都有来自国内外的信件，求医的，问候的……

1962年初春的一天，林巧稚收到了一封来自草原钢城的求救信，写信的

人叫焦海棠，是包头一家机械厂的女工，她已经生过4个孩子，可是每次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全身发黄，很快死去。如今，她又怀上了第5个孩子，怀孕已7个月了，要求林巧稚千方百计救救这快要出生的孩子！

这痛苦的呼声，深深刺痛了林巧稚的心，透过信纸，她似乎看到了病人焦急的目光。

像这样新生儿因黄疸而死亡的病例，林巧稚以前也碰到过，这是父母血型不合而引起的溶血和黄疸，叫新生儿溶血症，在当时国内文献上只有死亡的记载。

林巧稚不能粉饰这个严酷的事实。她如实地给患者回信，说明对于她这种病，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治疗办法，许多问题还在研究之中。

信发出后，林巧稚心情更加沉重，她放心不下这件事，继续查阅文献资料，终于发现国外有治愈的报告，采用的是小儿脐带血管换血的办法，她那积满愁云的心头，骤然照射进一丝希望的亮光。

林巧稚和她的助手找一个没有足月的死婴做一次模拟手术，基本搞清了解剖的位置和手术要领。

正在这时，塞外草原又传来更加紧迫的呼声，病人接到林巧稚的信后，出于对老专家的信任，恳求她想想办法：“您就把我‘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我不计较治疗的后果……”

林巧稚理解病人的心，经过一番试验，她有了几把握，因此当即给焦海棠回信，让她来京待产。

焦海棠喜出望外，她带着忧虑与希望交错的心情来到了北京。

住院不久，一个可爱的男孩出生了。可是如同前4次一样，婴儿出生后不久，全身上下变得蜡黄发亮，如同蜡制的洋娃娃。

一切症状都表明，这是典型的新生儿溶血症，除了彻底换血，别无他法。然而，这手术在协和还是第一次，一些人忧心忡忡，难作决断。林巧稚沉思良久，断然拍板：“总要有人来闯过第一关，就这样干吧！出了问题我来承担。”

她和助手拟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切开静脉，抽出病血，把新鲜、纯净的血液一滴滴注入婴儿体内……

手术成功了，健康的血液，在婴儿体内畅流，孩子皮肤的颜色，渐渐恢复了正常，白嫩红润，透出了生命的光辉。

病房里洋溢着欢乐的笑声。孩子的父母拉住林巧稚，不知说什么才好，为了表达一家人的感激之情，他们决定给孩子起名为“协和”以纪念这个让他们永远难忘的地方。林巧稚用自己的胆识与勇气，为我国的医学科学填补了空白。

（贾淑玲）

